

# Chapter 1

## 現代社會中的民主

路易斯(Paul G. Lewis)

### 目次

壹、前言.....	18
貳、民主的觀念.....	19
參、現代社會的民主化.....	29
一、現代民主的出現.....	29
二、資本主義與民主.....	34
三、社會主義民主與去極權化.....	37
肆、現代民主的限制與問題.....	44
一、現代社會中的民主化.....	45
二、實際現存民主的情況.....	49
三、後極權主義社會的民主化.....	54
伍、結論.....	62
參考書目.....	64
閱讀資料 A：資本統治與民主的興起.....	66
閱讀資料 B：反政治.....	72
閱讀資料 C：民主的未來.....	76
閱讀資料 D：民粹主義與憲政.....	79

## 壹、前言

將民主當成一種社會價值和政治組織的形式,可以回溯至上古時代,但若將民主視為一種政治生活的指導原則,則是再當代才開始嶄露頭角,至於民主化的鞏固與大眾民主的達成等偉大成就,甚至是直到最近才出現。即使民主政治並不是啟蒙運動時期政治思想的主要特徵,但啟蒙時代對專制政治的批判,以及對自然權利、社會平等與政治改革的鼓吹(參見 *Formations of Modernity*, ch. 1 之大綱, Hall and Gieben, 1992),這些對增強現代世界的民主思潮,有著重要的貢獻。直到接近十八世紀末之際,也就是法國大革命爆發時,民主的觀念才獲得較高的聲望。但是,要到十九世紀即將結束之時,大眾民主(mass democracy)的觀念才在現代政治生活中被普遍接受,而且成為顯著的價值,所謂大眾民主意指由絕大部份成年的社會成員以某些方式參與政治的民主程序。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甚至更為晚近的發展是:民主已經成為政治組織的共同形式,亦逐漸變成現代社會的一項主要特徵。雖然民主的觀念與實踐可以回溯到古典希臘時期,但是直到晚近,民主政治才成為社會生活的普遍原則而民主化也如星火燎原般地成為與代社會的核心價值。本章將探究民主發展所引發的諸多問題,例如在現代社會生活中民主觀念的地位,以及民主化與對其他現代社會形成過程之關係。這些探討包括了以下幾項要點:

1. 民主的歷史意涵何在?為何在大部分歷史記載的時期中,民主原則都被忽視?而在了十八世紀末,民主又如何再度獲得支持?

2. 大眾民主的現代觀念與較早期的概念有何差異？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出現的大眾民主過程，其所依循的社會脈絡又是如何？
3. 民主政治與已開發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之間有何關係？在這兩種社會組織原則間，能檢測出的矛盾程度又有多少？
4. 民主化成為現代社會主要的建構過程，其影響力的範圍有多大？

在分析大眾民主興起的各種相關議題之前，我們將扼要地討論有關民主的意義，以及民主歷史發展的相關問題。我們將更仔細地檢視現代社會的民主化過程，並討論學者在最近發展脈絡中研究的核心議題，以及中歐與東歐共產獨裁國家傾覆的原因。

## 貳、民主的觀念

民主有「統治」(rule)與「人民」(people)之意(例如，民有、民治和民享)，該字直接源於古希臘時期的用詞，它長期以來一直有著相同的意涵。「人民」這個觀念並不盡然具今日一般的積極意涵，它通常隱含群眾或暴民的意味，因而民主政治也意指另一種形式的群眾統治狀態，這個觀念仍然不會與一些當代的觀念有所迥異。民主是一種受歡迎的統治形式，在其間，人民確實擁有權力，並實際地掌握它。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就可以正面地看待它。誠如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他對現代社會字彙主要成份的討論中所指出的：

事實上，只有少數是例外的，在我們所掌握的記錄中，到了十九世紀，民主還是個非常不受歡迎的字眼，直到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之際，大多數政黨和派系才一致地宣稱其對民主的信念，這是一件最令人震驚的歷史事實(Williams, 1976, p. 83)。

習作 1：請查閱《企鵝版社會學辭典》(*Penguin Dictionary of Sociology*)一書，並閱讀「民主」這個名詞解釋。從這本工具書中，你所找到的民主定義是什麼？以及你所理解社會學對現代民主的主要焦點又是為何？

這本辭典將注意力集中在內閣制民主(parliamentary democracy, 如英國所運作的民主形式)及其一些關鍵性的面向，例如所有公民在各相互競爭的政黨之間，投票選出其領導者(即普遍的選舉權)。對民主的社會學式說明，一直都關注在現代社會的一些特性，例如在正式的政治過程中大眾參與的結果、民主與社會發展要素之間的關係，以及民主之目標在組織形式中的實行方式。我們將在稍後關切這些問題。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辭典的定義是將焦點放在內閣制民主上，它是一種特定的政治形式，而且並未涵蓋民主觀念的所有面向。雖然在一些國家中，內閣制的運作皆有一段長久的歷史，但其政治參與一般都只擴及到相對狹隘的社會團體，並且絕與現代大眾民主的安排不同。在一些十九世紀之前的社會中，只有權貴人士被賦予集會及表達己見的權利(可以透過「議會」來陳述他們心中的看法)，但是，這與大眾民主及人民權力(popular power)的觀念仍有一段相當大的差距。

早期對於民主的想法(絕非必然帶有一種支持的意含)是意



愛德華一世時的國會

味著由在人口中佔多數者來進行直接的統治。因此，由選出來的代議士進行統治，以及我們將逐漸討論代議民主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的早期形式，在十七世紀時可能皆會被視為是非民主的 (non-democratic) (Williams, 1976, p. 84)。然而，當討論到美國革命 (在一七七六年宣佈獨立) 及美國憲法的起草 (在一九八七年時公佈) 時，漢彌爾頓 (Alexander Hamilton)



詳細地說明代議民主的原則並論證其優點,如今這種概念在現代西方民主國家中已逐漸普及。當英國提出一個由早期政治改革者與啟蒙哲學家所提出的憲政統治模式時,代議政府的原則在美國及法國革命之後被更有力地闡釋與實施[參見本系列叢書第一冊《現代性的形成》(*Formations of Modernity*), Hall and Gieben, 1992, ch. 2]。代議制原則的闡釋[在一六四二年至一六四八年英國內戰期間,首先由平等派(Leveller)所提倡]很快被認為是在當代社會中的民主實現,投入一道全新的火花。藉由結合人民統治的民主觀念,以及由選舉產生的代議士進行統治的民主觀念(這是一種與古典直接民主截然不同的觀念),在現代民族國家的新形式中,民主政治成為一種可實行的選擇,它一方面保證有著革命性的政治轉化,一方面又維持符合憲政原則(constitutionality)及自由力量的持有(Dahl, 1989, pp. 28-30),這些發展都進一步暗示了民主觀念的演化。

當民主的本質與代議過程聯繫起來時,人民所代表的性質及它對政治制度的意涵,就相對變得愈來愈不重要。相對地,代議過程及其達成的方法則變得更加引人注目。無論如何,「人民」此一觀念也經歷了相當多的變化。婦女和奴隸並不是公民,也不是組成古希臘城邦(希臘文“polis”)或政治社群的一部份。在現代的民主中,亦總存在著一些對人類共同體成員參與政治過程能力的限制。例如,兒童與心智失常的人在今日仍未擁有選舉權。然而,選舉的門檻幾世紀以來持續地被縮減。在這種意義下,緊跟著啟蒙運動而來的時期,再次成為分水嶺。亦即在法國大革命(始於一七八九年)時,人民權力的觀念(在這種政治秩序的意義下涵括了大部份的人民,獲得了他們的贊同並提供了人民直接行使權利的可能性)獲得了動力並且成為重要政治運動的核心。

但是,革命的爆發挑戰了一種主要存在於歐洲的國家形式,並在這種直接行使人民權力的意義下,強化了反對民主



漢彌爾頓

以及反對促成民主實踐的意念。它強化了民主程序的界定以及與人民權力相關概念間的區分，如此一來，這些如今成為主要政治區分的基礎，也反映了概念上的差異：

在十九世紀中葉時，民主仍然是個革命性或至少是個激進的字眼，而代議民主的特殊發展至少部份是對此現象一種有意識的反應，超越實踐理性之程度與延續性。從下述論證的觀點來看，民主的兩個現代意義可以被視為是分岐的。在社會主義的傳統中，民主一直意味著人民的權力，亦即在國家中，大多數人民的利益是至高無上的，而且這些利益是實際地被多數人行使與控制。在自由主義傳統中，民主意味著代議士的開放性選舉以及維持選舉與政治論辯的開放性這些特定條件(如言論自由的民主權利)。在極端形式中，雙方的概念彼此成為競爭的對手(Williams, 1976, p. 85)。

因此，基於與法國大革命之背景及結果的不同，我們可以指出兩種民主的現代意義。第一種是與自由主義的傳統有關，它最強調政治代表的自由選舉以及維持其有效運作的條件；第二種提昇人民權力之觀念使得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得以增進，其利益的追求包含著大多數的人口，並在現代社會主義運動的情況下發展。

後者的概念與在啟蒙時期倡導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與分權(separation of power)的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和孟德斯鳩(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即使因而將其希望放在開明專制君主行動上)所預見的社會改良路徑，有相當大的差異，但卻與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78)所詳盡闡述的直接民主觀念則較為接近。洛克與盧梭在觀念上的分歧，明顯是由於他們在國家理論、主權概念與憲政秩序方面的不同所導致(參見本系列叢書第一冊第二章，Hall and Gieben, 1992)。這些觀念很明顯地也包括著民主的不同取向，以及在現代社會中實現民主的方法。就像我們將看到的，當大眾民主的觀念伴隨著十九世紀現代工業社會的發展時，這些不同的意義將呈現出進一步的重要性。代議制在制度上的表達及其組織的條件與形式，成為大眾在宣稱其有進入正式政治生活與參與立法過程的權利時，具有關鍵的重要性。

伴隨著逐漸成長的社會主義運動而出現的人民權力之觀念，因工人階級(working class)的崛起而取得新的重要性。工人階級靠著新的經濟與技術發展的形式在現代社會中佔有核心地位，但是，在早期階段他們是被排除在實際的政治參與過程之外的。當民主觀念進一步地進入政治辯論的戰線，而且其詮釋逐漸變得與不同社會團體的利益與渴望融為一體時，民主政治的意義也就更受到爭議，甚至成為彼此相互衝突的主張所探討的對象。實際上，在二十世紀晚期，每個人都想被視為是民主派人士[至少是個民主主義人士(democrat)](譯者按：“Democrat”是指





洛克

美國之民主黨人,“democrat”則指的是民主主義者,大小些之間有些微的差異),很少當代的政治人物會非常樂意被當作反民主人士。但很清楚地,不同的民主思想與實踐的傳統已經發展出來,儘管這些差異的起源與性質都隸屬於一個相互衝突的詮釋範圍中。威廉斯指出了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這兩種詮釋,並強調兩者間的對比:一方面,強調代議制及其與相關的選舉實踐和條件的關連,另一方面,強調人民權利的觀念與人民利益的追求與控制。

美國社會學家尼斯貝(Robert Nisbet)在不同的基礎上,也對兩個不同的民主思想學派間做出廣博的區分。然而,在他的觀點中,自由主義主張權力的分散,而民主所關心的則是政治權力的理論與結構(注意到其與威廉斯所提出的自由主義民主傳統之特徵有所連結,自由主義傳統主要是關心代議制,以及民主權力的人民來源與其運作的過程及目標有所隔離)。民主的觀念特別是指:權力的正當性(legitimacy of power)源於人民對政府運作之權力的同意。於是,大部份就有賴於「人民」以及被他們所接受的概念:

我們不過將人民當作一種個體在數字上的聚集 (numerical aggregate), 就政治管理的目的而言, 這些個體都被視為是分離且社會性地隔離的, 而聚集的形式與意義, 只有由國家及其法律所給定。或者, 從另一方面來看, 我們會將人民視作無法從文化中區分開來之份子, 它的成員無法與家庭、工會、教會、職業與傳統等實際上組成文化的這些因素隔離。這兩種對人民此一概念的思考方式有著相當大的差異, 而且在民主的政治理論中有著決定性的影響。當人民的意志被當作是一個純粹的政治字眼, 且其來自於社會的獨立性、在政治上被整合成個體巨的大集合時, 實質上, 人民的意志是一件獨立的事物。當它依據社會整合與文化傳統來考慮時, 其中政治或所有其他判斷實際地被形成且強化, 這又是相當不同的另一回事(Nisbet, 1962, p. 249)。

應該注意的是, 問題不只是人民在關鍵政治過程中的參與應該如何引導。這個議題也不同于: 決定哪些社會成員與多少「人民」應該具有資格成為公民身份而行動, 以及充分地賦予民主的權力, 諸如政治參與權與投票權。

讓尼斯貝更關心的是社會學式的問題, 亦即人民是否可以更適當地視為個體的聚集或者是社會的成員, 這些成員是嵌入或以任何有意義的字眼來說是不可與他們的文化根源和社會團體成員相分離的。雖然很快我們就會清楚地瞭解到這種區別有更多實際的政治意涵。將人民視作是一種個體聚集的觀點, 直接導致對國家的強調, 國家被視作是社會與政治整合的代理者, 並在其他社會結合的形式中提供一個領導者的角色。這經常指出一個民主的單一制觀點(unitary view of democracy, 譯者按: 單一制意指中央集權化, 即中央政府對各層面的事務具主導權), 其起

源可以直接追溯到啟蒙運動的主要思想家與法國理性主義者。毫不令人訝異地,其發展的一個主要刺激是來自於法國大革命,並且擴展到如德國這樣的歐陸鄰近地區。法國大革命的發展標誌著其轉向一個新的時期,而將其帶入與既有歐洲王權及專制主義國家間的直接衝突。

然而,以國家為中心的民主概念,在現代世界中漸漸地產生影響力,並且對二十世紀發展中的國家提供一個有吸引力的模式。在另一個觀點中,國家是多樣性的社會結合中的其中一種,而參與多元團體會被視作人民參與政治生活的特徵,以及民主發展的先決條件。這種說法再次與自由主義的民主概念與有限政府的觀念不謀而合,它也強烈地影響像英國、美國與斯堪地那維亞等民主模式的發展。並不難確定這兩種民主概念中那一種才是尼斯貝所支持的。就像他注意到的,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就增加人民的集體權力而言,民主取得非常高度的進展;但是,伴隨或是被用來達成這些進展的方式,帶來更大的社會一致性,並降低多樣性與多元主義等,這些並非單一制民主發展的前提。他很明顯對此感到惋惜,並且將單一制民主的散佈與官僚的集中化等量齊觀(Nisbet, 1962, p. 254)。

與這種發展相關的因素包括:現代社會大眾競爭的重要性(Hall and Gieben, 1992, 該書第二章說明現代國家的崛起時,認為它是個重要的因素,也可以參照以下的篇章)。以及一種對普遍認知和理性信心的堅持,表現在單一制及歷史必然性方面,顯然也受到啟蒙運動與法國理性哲學家遺產的影響。更進一步而言,尼斯貝的觀點是,現代社會的主要特徵就是不成比例地偏向單一制民主的發展。這種發展是跟隨著下述情形的實現,即國家權力能夠被提昇而不會因擁抱民主的原則及擴展它的人民基礎而有所消滅。因此,自由主義民主能發展所需的條件,被認為比堅持人民主權原則更加重要。追求人民權力、公民自主性與追求公共利益的大眾民主興起後許多有問題

的結果,確實是民主化散播及在現代社會條件下政治生活發展的一個主要面向。我們稍後將在本章中研究這些社會條件。但在此之前,我們在本節中檢討至今為止所導致的各項進步。

習作 2 : 現在你應該回想本節中所提出各種民主的不同變化形式與詮釋。試著列出:(1)已經做出的主要區別;(2)在現代社會中民主性質的意涵。

你應該已經很熟悉下列的重要區別:

1. 在直接民主與代議民主間,是後者形成現代政治民主的基礎。
2. 在由威廉斯(Williams, 1976)所提出的兩種現代民主的意義間:其中之一的人民權力,這種原先的民主原則是在後來社會主義傳統的發展中具體化的。另一種自由主義的詮釋,強調代議過程及其有效運作的條件。
3. 在兩種對比「人民」的概念間,其中一種是人民同意以民主觀念為基礎的政府,他們也被理解為個體的聚集,或是社會地與文化地結構化的實體,這種實體具有制度化的多元主義(institutionalized pluralism)此種可區辨的特徵。另一種具有差異的概念,則是由尼斯貝所提出的單一制式、以國家為中心的民主想法,而這也是盎格魯薩克遜(譯者按:主要是針對英美兩國)這些國家的自由主義民主的特徵。

上述提供我們一些概念上的基礎,藉由這些概念,我們檢視了民主化的過程,並檢視與其他在現代社會發展中佔有重

要角色之過程間的關係。我們應該轉而檢視為何民主在現代社會中成為如此強有力的原則,以及為何民主化過程是現代社會發展過程中一個的主要特點。

## 參、現代社會的民主化

英國大眾民主的起源(包含了大多數政治建制所接受的民主原則)以及人民權力更為解放的有限架構,約略始於十九世紀中葉。因為害怕民主會帶來暴民統治的威脅、教育份子與文化菁英的墮落,還有社會中最不受支持的成員進行獨裁統治的結果,所以對民主有著長期的懷疑與拒絕。隨著工業工人階級的成長與其不滿徵候的再度出現,統治階級更會畏懼大眾民主將會導致特權階級的財富被工人所佔有,以及自身政治支配地位的終結。彌爾(John Stuart Mill)也論證道,「理性民主」(rational democracy)的前提是:「並非人民自我統治,而是他們對於良好政府的保證」,最好的政府必然是「最有智慧的政府,且總是相當稀少」。然而,他較不擔心政府的形式,而是一個未加區分而平庸的公共輿論,以及由民主所導致之對個人自由的威脅(Arblaster, 1987, pp. 48-9)。由於這種觀點,彌爾成為現代自由主義民主的主要代言人。對大眾民主憂慮的持續,以及在一八六七年改革法案(將投票權擴展到大多數戶長)之前的辯論,警告的聲音就被聽到了。

### 一、現代民主的出現

但是,當某些對大眾民主的結果仍堅持保留意見時(例如我們在尼斯貝的觀點中所見到的),最為深沈的恐懼很快就被



證明是一種幻想,而對政治民主的公共態度也出現明顯而快速的變遷。大眾民主的出現證明了並非像以前所認定的,是對支配階級的一種威脅。為何會如此呢?什麼參與了民主議題與投票權擴展等公共態度的變遷?公共輿論的變遷有幾點理由,而情況通常是在議題中討論不好界定时就是如此,情況比原來想的還要複雜。就像阿爾布列斯特(Arblaster, 1987, p. 50)所指出的,工人階級的選票被分成兩邊,即現存(自由與保守)政黨(現代具較廣泛基礎的政黨之發展,在稍早前就已經開始)與花費許多時間心力才從工人階級自身發展出來的社會主義政黨。

相較於感覺自身受到工人階級威脅的人而言,工人階級非常欠缺同質性,並且從技術、財富、安全與組織經驗來看,在他們的階級有很明顯的分化現象(就像摩爾在一九六七年出版的書中費力去說明的,在支配階級間也同樣地有明顯的經濟與政治差異)。既不是投票權的進步性擴展(無疑地在十九世紀只有男性人口才能擁有),也不是民主社會與政治秩序的具體化。事實上,正是在接近十九世紀末投票權擴展所出現的非革命性結果,才使得英國社會更徹底的民主化,並在往後的日子被普遍接受。很明顯地,民主並非意味著文明的終結,或更實際地從現行享有特權與物質優勢者手中排除這些事物。

阿爾布列斯特(Arblaster, 1987, p. 50)認為接受大眾民主的最後步驟,是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回應所有社會團體以普遍社會價值的名義下所作出的大量犧牲。就像美國總統威爾遜所說的,這類犧牲「只能以民主之名獲得,而不能期待僅僅是因為對社會秩序的單純愛國心」。於是很快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民主原則已被更多已開發的西方國家所接受,並且按照當代的觀念,大眾民主的鞏固可以說在一九二八年的英國已經被達成了,因為投票權已擴充到整個女性人口。在這個階段,政治民主也從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到大部分大英帝國的統治區域中(紐西蘭、澳洲與加拿大)穩定地建立起來,當然



阿拉巴馬州，一九六五年：黑人企圖去抗議被阻止登記投票

也包括美國，儘管美國的主要社會團體，特別是黑人，實際上被排除在國家大部份地區中的政治共同體之外。在南部許多州，識字能力與人頭稅(poll tax)種種必要條件，將許多黑人擋在投票所之外，而只有到了一九七〇年左右，在第十五號修正案實施後，成年的黑人才例行性地擁有投票權。

民主是在戰後威瑪德國時期才被引介進來，當然接著就發生希特勒(Adolf Hitler)的納粹統治。其他已開發的西方國家(法國、瑞士)在二次大戰期間仍然否定婦女的投票權。就如霍爾與葛班(Hall and Gieben, 1992)在其書中第二章所說明的，戰爭與軍國主義是現代國家形成的主要因素，所以戰爭的結果對現代民主的出現是非常重要的。一九四五年軸心國(Axis powers)被擊敗之後，意味著法西斯資本主義獨裁統治的終結，並且還撕裂了資產階級的保守聯盟，誠如莫爾(Moore, 1967)所描

述的, 牢固的傳統利益阻礙了早期民主發展的路徑。而因為在戰爭的努力下, 動員與國家統一的議題惹人注意, 所以民主化也在戰勝國中獲得進展。被國家統一的驅力所超越的階級分化, 這種陳腔濫調當然在英國的民主化過程扮演必要的角色。

如同我們所看到的, 國家統一的情感以及英國人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患難與共, 從而克服了對民主的延遲與阻撓, 並促成了一九一八年賦予完全的男性選舉權(譯者按: 在此之前, 英國成年男子的投票權有財產上的限制), 十年後進一步將選舉權開放到女性的身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民主化的貢獻, 是經由協助民主在早期的落腳處(如英國)繼續擴展力量, 以及經由打破競爭資本主義國家的獨裁模式來擴展民主, 如德國與日本。於是此種主要由工業資本主義和世界大戰所策動的力量, 成為大眾民主建立的原因。大眾民主在這些民主化的先驅國家中已經鞏固, 其擴展到資本主義的發展路徑是隨著法西斯主義, 而非內閣制民主鞏固的國家。如此, 大眾民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就已具體成形了, 其勝利表現在大部份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普遍的(或幾乎普遍的)包含成年男女的選舉權。

當然也不乏明顯的例外(瑞士的女性未具選舉權, 以及在美國南部各州黑人被排除在投票行列之外, 譯者按: 瑞士在一九七十年代之前, 女子尚未被賦予投票權; 而美國南方各州藉由像是識字測驗等技術上的限制, 使得平均教育水準、社經地位較低的黑人無法投票, 一直到一九六五年美國國會通過「民權法案」, 美國黑人才普遍享有投票權), 但很清楚地, 民主仍然較以往更具體地被建立起來。就像當初十九世紀在英國的例子一樣, 經濟情況是特別地有利於支持民主秩序及其所承諾的權利行使, 即便如此, 這些情況仍在戰後的先進國家中延續了四分之一世紀。這些情況也提供進一步滿足民主需求的機會。例如, 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 在共同戰爭目標的追求中此種國家動員的經驗, 在一九四五年為一個更廣泛的民主目標之具體化與實行創造了基礎, 而這些比形式民主與完

全代議政府體系的建立更進一步。

但是一般而言,在現代(佔有優勢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世界中民主化與大眾民主的散佈,是涉及到代議政府的實踐與制度以及民主的自由主義變化形式之建立。在余本(Therborn)的概念中,所指的是國家其代議政府由選民所選擇,而選民是由全體成年人口所組成,他們的選票都是等值而且被允許依照自己的政治偏好來投票,而毋需畏懼國家的脅迫。達爾(Dahl, 1989, pp. 212-20)對其有進一步的解釋,並論證道,反映在現代民族國家其民主建立上的規模變化及其特殊結果,協助產生一套政治制度的發展,而將現代代議民主的形式從所有其他的政治體系中區分出來。他將這個結果定義作多元政體(polyarchy),它可藉由兩種廣泛的特徵區分出來:公民權擴展到相對而言較高比例的成年人身上,以及公民權是包括了可以反對與投票更換政府中最高首長的機會。

達爾(Dahl, 1989, p. 221)將多元政體的普遍特點結合七種制度的呈現,這些制度提供基本民主原則的形式與實質:

1. 民選官員對政府決策的控制權是由憲法所賦予的。
2. 在自由而公平的選舉中,選民在沒有受到任何強制力的壓力(就算有壓力也是非常微小的)下,理性且定期地選出公職人員。
3. 普遍性的投票權,即在民選官員的選舉中,所有成年人皆具有投票權。
4. 競逐公職的權利,以及在政府中的民選職位開放給大多數成年人。
5. 意見表達的自由,以及在無懲罰之虞下對政治事務表達意見的公民權。
6. 不同資訊來源,以及接近不受政府控制的知識與資訊的公民權。

7. 社團的自主性, 藉由形成相對獨立的組織(包括政黨與利益團體)來協助公民達成其權利。

當然, 這些特點應該被深植入實踐中, 並且不能只是一種用來裝飾政治門面之名義權利。它們反映出在現代社會中為民主所實際採用的形式, 而不僅僅只是理論觀點的一部份。

習作 3: 回想一下你從本節中所學習到的內容, 並列出促進現代民主出現的主要因素。再回頭檢查看看你是否有所遺漏。

## 二、資本主義與民主

在資本主義發展相當發達的社會中, 已率先建立起政治的民主。民主化似乎與資本主義的現代化共同發展, 一般而言, 這意味著現代性的達成, 狹義而言, 這意味著生產資源被私人所掌握, 以及形成了以追求利潤為主要動機的都市工業社會。就某種程度而言, 這種結合是不難理解的。有效率的民主需有具備基本識字能力以及有知識的大眾, 他們藉著充分的社會技能使得政治參與變得有意義, 相對而言, 這也暗示著一個已開發並相對較為現代的社會秩序。資本主義一直與市場關係的發展、強加調節機制的缺乏, 亦即與最小國家干預的自由主義秩序之發展有關連。這也可以被理解為與公民權的擴展以及社會自主性的發展一致。但在其它方面, 資本主義與民主之間的關係會被認為還有許多問題。就如許多社會特權在民主原則的普遍接受之前(事實上在之後也一樣)注意到的, 政治平等的擴展到包括勞動者以及無產的大眾, 如此就會對既得利益者有所威脅, 他們是藉由延續與擴展既存的不平等結構之過程來獲



取利益。

雖然誠如前面所注意到的, 至少投票權的擴展似乎沒有對資本主義或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之一貫手法形成挑戰, 反而還協助它穩定了其所運作的社會政治情況。這種看法很快就被社會主義領袖如恩格斯與列寧所認可, 但就如余本(Therborn, 1977, p. 32)所暗示的, 將該領域的一般論證與解釋假設, 歸咎於一種關係動態是不適當的, 這樣的關係動態已經在許多社會中發展幾世紀之久, 而根本從未依循相同的路徑發展。如果將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或自由主義、內閣制)民主之間的關係解讀的太過直接, 將會產生誤導。但是, 在資本主義發展與民主化進展之間似乎確實存在一項基本關係, 資本主義包含許多有助於民主化過程的傾向。就如余本一直主張的, 此處主要的相關關係是, 有關資產階級民主的特徵涉及一項「在單一制的基本架構中競爭性的區分」。事實上這意義在余本論文的摘錄中已經勾勒出大綱, 而你現在應該對它加以研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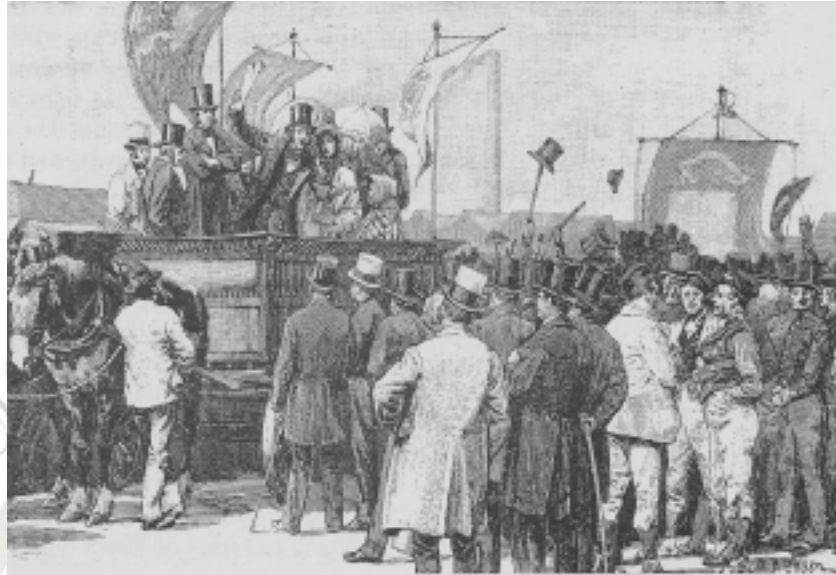
習作 4 : 現在請參照「閱讀資料 A」, 由余本所寫的「資本統治與民主的興起」, 你可以在本章的最後部份發現到這篇文章。表列出余本所提出在資本主義中對資產階級民主核心特徵的發展造成影響的固有傾向(余本已經找出這些項目)。支撐此一民主形式發展的「單一制中的區分」(division within unity)的性質為何?

余本提出與民主發展有關的資本主義六個內在傾向, 然而從具體的歷史發展的角度而言, 新的單一制架構是出現在現代民主國家的形式中(請參見 Hall and Gieben, 1992 第二章與此有關的討論)。自由貿易與工業的出現, 創造一個「分裂競爭

的關係網絡,它貫穿單一制與主權國家中的新統治階級——就是在民族國家與市場的單一制—分化中,民主化的過程才得以萌芽」。如此,民主(如英國)典型地被引介到上層的資產階級與商業化地主間,然後,才被擴展到資產階級的其他部份、並非是很上層的中產階級團體以及其他在體系中較未涉及到利害關係的成員,如戶長。這樣的發展似乎是一種普遍的傾向:不過,這樣的過程並非是必然的。儘管這樣的過程是可以避免的,而且變遷也可能造成在資產階級與原有地主之間的排他性妥協,如此就阻礙了朝向民主發展的道路,但是,就如摩爾在其名著《獨裁與民主的社會起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1967)一書中所勾勒出的,特殊社會情況與特定歷史遺產會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朝向大眾民主的進展是出現在包含單一制與分化的架構之中,工人階級部門從資產階級要求更多政治代表性的動力中獲益,並且在更進一步民主化的運動中,形成他們聯盟的一部份。然而,出現對民主化作為普遍過程以及普遍權利立法的一致性反抗。因此,在一八四〇年代英國人民憲章運動者的失敗,就是一個對進步的民主化過程著名的倒轉,雖然其中大部份的要求後來都在一個逐步改革的基礎上漸漸地被允許。當工人階級的騷動通常是資產階級民主運動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時,顯而易見的是工人階級的政治進展有賴於資產階級的夥伴關係(patronage),並且「若只藉助其本身獨自的資源,根本不可能獲得民主」(參照「閱讀資料 A」)。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的命運可以視為是對這種觀點的實際肯定,它是以工人階級的名義而獲得歷史性的政治勝利最有名的例子。

當一個社會擴展政治權利的範圍時,民主化也就因此意味著對工人階級附屬地位的肯定,並且確定他們的社會與政治權利受制約之性質的實際劣勢。普熱沃斯基(Przeworski, 1986, p. 63)強調這一點並注意到:「在比利時、瑞典、法國與英國,



英國憲章運動

就是有組織的工人在大罷工中失敗，最後採取一個馴良的姿態後，民主體系才被鞏固下來」。儘管如此，一般而言民主的進展是一致的，而且在一些國家中的進展是相當迅速的，大部份是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也是動態的緣故，且比早期資產階級所能想像的更為密集。正是這種密集的經濟發展，才使得工人階級的政治進展比其剛開始出現時更能被接受。階級戰爭並非如以往許多人所相信的情況，轉而成為一種非零合的事件(其中並未牽涉到某一競爭者的決定性失敗)，並且資本主義與民主的基本原則被證明絕不是矛盾的，雖然這並非意味民主的進步是沒有限制的，或先前被排除團體的進展來支持自己的說法。

### 三、社會主義民主與去極權化

民主的散佈不只是證明其與資本主義相容，而且在二十

世紀, 它也集中在由資本主義生產所支配的地區。民主化在共產主義世界當然就較受到限制。在一九一七年俄國經歷了所謂的無產階級革命, 但作為社會與政治動亂基礎的目標是混亂的, 而且其民主建立的意涵是非常有限的。在一九一七年俄國發生革命的關鍵背景條件是, 舊帝國由於是半開發的強權, 其面臨無法維持現代工業化戰爭的花費而導致其逐漸衰弱, 並且在超過兩年以上驚人的戰爭損失後, 其社會也面臨解體的情形。就像霍爾與葛班(Hall and Geiben, 1992)在其編輯書中第二章所勾勒出的一樣, 戰爭也是現代國家中一個主要的組成元素。同時也破壞了半傳統而部份現代化的帝國基礎。隨著一九一七年六月由一個社會主義總理所領導的後沙皇臨時政府所展開的猛烈攻擊之後, 那個大部份由農民所組成的軍隊崩潰了, 農民捨棄戰爭轉到追求和平與食物, 並且在逐漸失去控制的鄉間開始佔有土地。

工人、貴族、資產階級與知識份子也是相當積極的, 儘管他們沒有依著組織或政治目標聯合起來。在俄羅斯社會民主派人士(或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者)中少數採取強硬路線的布爾什維克黨人(The Bolsheviks), 在動員相對少數的工業工人階級方面是相當成功的, 而對奪取政治權力的需求也有清楚的觀點, 並且對能夠做到這些也是相當有信心的。這些混合的因素成為十月革命勝利的基礎。從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觀點視之, 布爾什維克黨人斷然地拒絕所有自由主義民主的思想或代議政府的觀點, 反而期望直接民主的形式, 它是以社會生產資源的完全發展, 以及透過一致發展的過程取得世界社會進步這兩點作為前提的。代議民主的元素或自發地來自於直接民主的形式, 實際上很快地消失在共產黨的黨國體制中(the communist party-state)(布爾什維克黨人在一九一八年開始自稱為「共產黨」), 並且在史達林的領導下, 它的機構逐漸地致力於強制性的政治紀律之上, 以及特別在一九二九年到三

一年實行農業的強制集體化之後，所進行的經濟過程之調整與管理。

與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傳統路線及馬列主義的俄國變形一致，蘇維埃的政治獨裁統治與官僚國家支配形式，被稱為「社會主義民主」。事實上與任何對民主的理解沒有任何的關係，而更引人爭議的是，與其他社會主義的關連也不大。蘇維埃的實踐產生了具有影響力的一黨統治的形式，儘管仍有一些對民主原則的訴求。這並不是基於西方大眾民主的運作中之競爭性選舉、代表的開放性選擇，以及資訊與意見的自由流通。蘇維埃主張的主要部份是基於對自由主義民主的批判，並斷言集體價值與大眾行動優先於個人主義的優越性(在此你可以回想一下，由威廉斯與尼斯貝所提出與此相關議題的對比)。一般都認為自由主義民主的劣勢與代議政府的缺陷為大眾民主本有的觀點所彌補或甚至超越，這種觀點被反映在社會動員、介入官方組織的高層次，以及共產主義其福利主義觀點的運作。

以上是對蘇聯理論家所發展的社會主義民主的官方概念之總結，並以下列用語來加以界定：

社會主義民主的根本差異在於以下的事實：這是歷史上首次由勞苦的、數以百萬計的平民大眾來組成政府。而且這是真正由人民統治的政府，不僅是口頭宣示而已，因為，它是以生產方式和工具的社會所有權為基礎。社會主義民主的創新特徵在於下列事實：它不僅公開宣稱廣泛的社會—經濟、政治與個人的權利和自由，而且也對這些權利作出保證。生產方式與工具的公共所有權，是達成上述作為的主要方法，也是主要的保障方式。人對人剝削關係的取消，導致從形式平等轉為真正的平等。由蘇聯憲法所保障的蘇維埃民主，意味著在國家的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生活的每個領域中，所有公民的



權利都是平等的。國家與個人的關係在社會主義的情況下是截然不同的。為了保障公民的權利，國家負有施行這些權利的責任。當然，我們確實稱蘇維埃社會主義民主為真正的民主。因為我們藉由大眾參與生產經營、國家與公共事務的程度來判斷。這樣的機會擴展到每一個蘇聯公民的身上(*Soci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1981, pp. 31-2)。

蘇維埃對自由主義民主之實踐及西方國家「實際存在的民主」其性質的批判，當然有某些基礎(第四節有更詳盡的討論)，但很少有證據能支持他們的民主實踐較為優越的宣稱。蘇維埃公民確實在大眾的基礎上，參與管理以及公共事務，但是，他們對決策的影響以及參與選擇佔有權威地位的人，是極微不足道的。許多人確實參與了政治過程，但是，這種參與只發生在依隨著相當組織化的路線，而幾乎都不是自願或自動自發的。對這些議題的持續辯論，因一九八〇年代晚期的蘇維埃新思維改革(perestroika)而加速掀開序幕，大多數歐洲共黨國家在一九八〇年代結束時發生政治內鬥，並且在東歐與蘇聯都出現許多經濟部門的漸進性崩潰，而這些發展對蘇聯遠方的附庸國與衛星國家，都有著關鍵性的政治與經濟衝擊。當然，在這些地區的政治變遷在整個戰後時期一直缺席，但是，一些發展像是在後史達林時代以選擇性壓制(selective repressive)取代大規模恐怖，從一個很低的標準看來，已經是朝向憲政主義與民主的一步。政治民主化的企圖中一直未曾缺席，也不乏實際出現的案例，比如：在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一九六八年的捷克以及從一九八〇年持續到一九八一年的波蘭。在每段時期中，這類企圖都被軍事方式與再度實行之更強大的獨裁統治所逆轉。集權主義的基礎是在下述的意義下獲得持續，亦即一黨統治的強化、馬列主義被再度肯定為唯一公開的正統，以及由廣泛強制力所維持的政治穩定性。



羅馬尼亞革命, 一九八九年耶誕節

但是,在現代社會中的民主化並未受限於朝向政治民主所需採取的形式步驟。在共黨主義黨國這個已經落伍的政治空殼中,有著「社會主義民主」的官方形式以及其極權主義的實踐,由於社會變遷的產生,培養出另一種民主化的形式,其發展是對共黨獨裁統治逐漸運用壓力,並提出某些方法解釋為何東歐各國的政權如此快速的崩解,並在一九八〇年代完成的原因。阿累托(Arato, 1985)論證道,配合普遍主義與代表性,現代民主意涵著多元主義以及更大的政治多樣性,其中意味著對政治民主化的限制,以及在東歐國家政治民主本身的限制,就某種程度而言,是可以由另一種人民行動的形式來規避或補償。

這些行動形式對東歐的發展具有關鍵的重要性,並在共黨獨裁統治的崩潰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它們可能包含了小規模範圍的行動,如懺悔自由(confessional freedom)的達成、獨立和平團體的建立或者自由貿易聯盟與工人委員會的組織兩者擇一。這意味著人民行動對其他脫離民主控制之領域的擴展。同

時,這類行動因缺乏建立議會民主的企圖而停止,而且無法觸及獨裁統治的政治基礎。但政治獨裁統治與成長中民主的徵兆之連結,確實指向民主化出現的型態以及在現代社會中新政治發展形式的可能性。

民主與極權主義間歷史關係的說明在討論中已經釐清,一些國家的民主化(德國、日本)只有以世界大戰以及法西斯政權的軍事失敗為代價來達成。一九八九年東歐共產主義的崩潰,以更進一步的方式暗示著民主可能從極權主義中出現。由於摧毀法西斯政權並在德國與義大利建立民主需要大量的外部力量,在東歐的極權主義似乎是從內部崩潰,在過程中內部的社會力量扮演重要的角色。超級強權對抗的外在負擔以及軍事競爭的成本也在此處扮演必要的角色,這種軍事競爭對西方國家是項繁重的負擔,但是,對蘇聯與華沙公約組織國家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而言,這樣的負擔更是壓倒性的,它們耗盡消費部門而維繫以國家中心社會主義的軍國主義精神氣質(militaristic ethos)。再者,匈牙利與波蘭等國的民主化過程在本質上是和平的,雖然早年暴力鎮壓的經驗(1956, 1970, 1976, 1981-2)影響到後來的發展。

在羅馬尼亞與阿爾巴尼亞的去極權化過程中即出現更多的暴力面向,而在東德與捷克也有相同的情況。但一般都認為在東歐共黨獨裁統治的崩潰,若不是直接接引發的,其迅速崩潰也是經由逐步的社會變遷過程,社會大眾實際上與正式政治生活的所有面向逐漸疏離(alienation),並且將根植於日常生活經驗的新民主觀念加以具體化。愈來愈多證據證明控制經濟的失敗,加上前文所提及的軍事負擔,以及東方消費主義(Eastern consumerism)這種令人沮喪的希望(由先前的社會主義政府所鼓勵,而使人民無心投注於政治),強化了上述的想法。許多人也爭論道,在共產主義下發展的對民主價值之強烈社會承諾,以及民主化逐漸擴張而協助創造獨裁統治國家崩解轉換的

情況, 都培育了民主化。對這些社會過程本質的進一步洞見, 是從康拉德(George Konrad)的文章中擷取而發現到的, 文章中他在文章中勾勒出那逐漸瓦解共黨獨裁實踐的民主的理解。

習作 5 : 現在參照「閱讀資料 B」, 由康拉德所著的「反政治」一文。在一九八一年團結工聯從波蘭公共生活中被消除之後, 康拉德指出在東歐是什麼種類的民主? 什麼因素鼓勵其發展與它採取的是什麼形式?

匈牙利作家與社會學家康拉德, 提出社會的「自發性凝聚」(spontaneous cohesion), 其作為團結工聯民主運動的基礎, 並且描繪出東歐社會脈絡的許多特徵, 而這樣的社會脈絡鼓勵了非正式團體的形成、特定形式市民社會之發展、以及在共黨支配的區域中實行自發性民主化之傾向。這些包括自我管理的持續需求、社會中的自由溝通以及非物質主義價值的持續依附, 這種價值培育了社會自主性的發展, 並支持朝向民主的自我管理的傾向。就是這類因素鼓勵在東歐極權獨裁統治的崩潰, 即使其仍具有集中化控制的能力以及國家機制的權力。在這種觀念下, 一九八九年的轉捩點, 反映出在東歐民主社會與一個獨裁國家與日俱增的緊張關係; 市民社會擁有漸增的自主行動與承諾自我管理的能力, 而共黨國家之權威卻逐漸衰退並僅僅只有些微的能力處理社會和經濟變遷的過程, 但是仍具有強大的壓制與強制自我防衛的殘餘權力。

這些發展肯定了其他關於現代民主之社會基礎的判斷, 也肯定了質疑的過程在社會實踐上是隱匿的這種觀點(也就是沒有行動者必然地意識到質疑的過程), 以及「意識型態的工作總是致力於恢復確定性的任務, 無法為此一實踐劃上句點」

(Lefort, 1988, p. 19)。民主與極權主義是有區別的, 民主仍然是保有與歡迎非決定性(indeterminacy)的歷史社會, 而民主化過程就是其中一種制度化的不確定性(institutionalizing uncertainty)的過程, 以及「所有的利益都是從屬於不確定性」(Lefort, 1988, p. 16; Przeworski, 1986, p. 58)。許多人可能會爭辯說, 極權主義主要是以其意識型態觀點的堅固性作為基礎, 並且它自身較少表現出極大化國家權力於社會之上的能力, 反而較常表現出的是想要作這件事的慾望。但是, 即使缺乏一種形式化的、教條式的意識型態, 現代社會本身的條件也會產生鼓勵社會組織化與控制的傾向, 導致政治過程的例行化以及其可預測性的提高, 並因而不鼓勵非決定性與降低不確定性。在注視這個促進現代民主興起與民主化散佈的過程後, 現在我們將轉而檢視它們在現代社會中所遭遇到的限制與問題。

## 肆、現代民主的限制與問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已開發資本主義國家中, 現代民主的地位已獲得鞏固與強化, 而且一九八〇年代末期民主化傾向在先進共黨國家中快速取得動力, 其依循的是一個已在其他地方建立的趨勢。在一九八五年一般評估在前十年有十六個國家已經朝向民主發展, 然而只有六個是朝反方向(*The Economist*, 8 June 1985)。民主化的全球性發展軌道已經以各式各樣的方式呈現出來。杭廷頓(Huntington, 1990, pp. 36-7)指出民主化的第一波, 是從一八二〇年延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 第二波是在二次大戰後其中包括去殖民化的過程而延續到大約一九六〇年, 而第三波則是開始於一九七四年葡萄牙與希臘獨裁統治的結束, 並延續到至整個一九八〇年代。根據杭廷頓的說



法,在一九二二年有二十六個國家可以視為是民主的,在一九六二年有三十九個,而一九八九年有五十個。達爾(Dahl, 1989, pp. 234-9)指出三個有輕微差異的「多元政體」的成長時期:一七七六年到一九三一年,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九年以及一九八十年代。

在這個基礎上可以指出,在一九三一年有十八個完全多元政體(依照上一節達爾所用的表達方式)以及有三個男性中心的多元政體(male polyarchy, 亦即僅有男性而排他投票權的名義上的民主),一九四五年以後大約三十年的期間,有三十六到四十個國家屬於此類,而在一九八十年代中期大約有五十個國家(約佔一百六十八個名義上獨立國家中近三分之一)。代議政府的擴展以及接受民主作為政治生活的的普遍原則,首先在少數國家中而後來則在許多的國家中,反映出政治平等原則的擴張以及更多的選舉參與機會。但在許多國家中,民主原則的接受以及大眾民主的建立,不必然地與社會或其政治秩序的民主化是同一回事。政治權利的行使條件決不是平等分配的。在人民權力意義下的民主,被當作支配性政治形式來接受與行使,即使在現代社會中也並不是公共生活的普遍特性。

## 一、現代社會中的民主化

民主化一般意味著自由主義代議民主的接受,以及其接合於更具菁英統治的現存體系,但是,至少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後時期,即使在它曾經發展過的更有限制的現代意義上,民主僅部份地實行在大多數的先進社會中。民主自由主義形式的完全建立,也伴隨著國家權力與角色的大量擴張,在一些概念中(Nisbet, 1962)民主本身代表著對民主原則的威脅以及對民主概念更充分發展之情況的破壞。更進一步地論證,可以說民主原則本身在許多社會中只是部份地被接受。明顯地,對人民權

力的觀念及其意涵, 仍有許多公開的反對(在當代的情況中一般都是指社會主義者), 並且由其他人所提出的民主單一制概念也是脫離基本原則而無法接受的。

因此, 民主原則逐漸地受到公開接受, 正是伴隨著其中一種民主可能的變化形式之日益強調而來的, 然而一直有一種直接反對民主理想的傾向, 民主理想會被技術與經驗性基礎的懷疑所取代, 這種懷疑是有關民主化在現代社會條件下的存活能力。例如, 現代社會以及在當代政府決策過程中所涉及的技术專業程度的複雜性, 一直宣稱無法與大眾政治及人民的擴大參與相容。因此, 以普遍意義而言, 民主的進展可以被描述為是部份的, 並且決不必然地是以普遍接受之價值為基礎。某些人一直懷疑的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是否真的有任何朝向民主或人民權力方向上發展的全球性運動(Arblaster, 1987, p. 56), 雖然獨裁統治在南歐而最近更出現在拉丁美洲與東歐的崩潰, 或許可以提供再檢視這種論點的基礎。

因此, 民主化確實將自身建立在現代社會的政治議程上, 但是, 通常仍會受限於它的社會理解。在現代社會發展中的相互連結面向之間的各種矛盾並不難指出。雖然戰爭有著鞏固在一九一八年後英國的政治民主與擴張代議政府的效果, 而在二次大戰後提昇英國戰士的社會期待, 並激起滿足更廣泛民主權利的需求。英國在一九四五年的選舉立即投票驅逐了領導戰爭勝利的保守黨領袖: 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 而選出承諾引進福利國家的工黨政府。基於這些渴望是一個與人民權力的觀念更加接近的民主概念, 並以相當程度超越了代議民主更形式的制度之想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 英國轉化成完全的代議民主國家, 而對在一九二六年經歷大罷工(General Strike)失敗經驗的貿易工會成員, 或是在經濟蕭條時期(the Depression)在舊工業地區遭受長期失業的其他人來說, 都提供很少的滿足。

形式的民主權利已被感到不夠充分；更多的經濟安全與個人自主性也逐漸被認為是完整民主社會的關鍵特性；實質民主的觀念也逐漸補充或取代形式民主，其包含著關於以「藉由特定目的與價值來朝向實現其特定政治團體的目標與工作為特徵的體制。在這些目的與價值背後存在著平等的原則，它是被用來不僅是形式上也是實質上地區分出民主與非民主體制間的差異」(Bobbio, 1989, p. 157)。這個原則指涉的不只是由自由主義憲法所提供的法律平等，而且還指涉一種包含著經濟平等此一主要元素的社會形式。如此，主要有關於政府形式的形式民主其與實質民主間的區分更涉及它們內容的差異。相較於以往任何一個英國政府，民主的概念被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年執政的工黨政府強烈且清楚地表達出來，並且在民主化的推動上超越大眾代議制的自由主義形式，而被視為一種政治變遷的激進形式。

就像大多數美國觀察家所認為的，對強烈鼓吹代議民主原則的地區，雖然是經由同意而達成的，但是可能會出現出社會主義革命(Brinton, 1965, p. 4)。福利國家對國家健保服務的採用、根據一九四四年法案所進行的國家教育體系的擴張以及提高所得支持機制的採用，上述這些肯定了社會民主的原則及增加平等的承諾。在這樣的過程中，現代「公民資格」的觀念獲得了更具體的定義。此外，雖然緊接著戰後期間，經濟的情況是艱苦的，而逐漸從戰爭期間的毀滅與緊縮恢復過來，並且穩定成長過程的開端，提供此類權利可以在實際的條件中加以建立的脈絡，而且它們的施行重新肯定作為戰後社會秩序的主要元素。就像將近一個世紀之前的一八六七年改革法案的情況，在國際穩定的脈絡下，戰後復原與經濟成長也意味著工人階級的情況可以在不威脅中產階級團體的所得與經濟基礎的情況下加以改善。

福利國家的承諾很快就被保守黨所分接受，這類「社會



失業者的飢餓遊行，一九三二年

民主」的原則大部份在過去幾十年來政黨間政治衝突的領域中是不存在的(重要的是,在穩定的經濟成長之過程結束以及不同團體間的經濟利益出現更大衝突之後,這類實質民主的面向在一九八〇年代遭受到批判性地檢視與抨擊)。現代「公民資格」觀念的發展(這是本書第四章的主題)是包含了對權力多元化的考慮(對易於被邊緣化的團體授權,並且更接近對較大規模、階層化組織中決策程序之規定),而各領域的民主化除了政治領域外,也超越代議政府形式上的移除(remit)。在工作場所中權力關係的轉型,以及工業民主的建立(請參見企鵝版社會學辭典的條目)被視為日益重要,儘管會明顯引發民主與資本主義間關係的進一步問題。在英國與斯堪地那維亞國家所發展的福利主義模式中,至少在大多數先進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中最終皆會被採用與複製,這也包括了西歐與美國。但是,就像義大利政治理論家巴比歐(Norberto Bobbio, 1987, p. 26)所說的,在民主的理想與「實際存在的民主」之間有一道鴻溝,它



是清楚可檢測的,而民主理想的充分理解仍然是遙遠的前景。同樣由巴比歐所提出的民主的六個「轉型」(transformations)說明了不一致的存在,亦即容易受右派詮釋的影響,就像準無政府會威脅到國家的解體;或被左派所影響,認為議會民主變成一個專制體制。我們現在轉而檢視這些轉型的性質。

## 二、實際現存民主的條件

第一個轉型指的是現代民主的觀念源頭,是以個人主義式的社會概念為基礎,而有別於古典的概念,其所想像的是一個沒有來自封建采邑或統合主義式社會(corporatist society)此種中介體所造成的分割國家,而統合主義式社會是指個人經由隸屬特定團體的成員,成為在社會秩序中界定清楚但有限的角色。相反地,在現代民主中的個人似乎已逐漸降低影響力,而作為多元主義民主特徵的各種不同觀點與利益,已經取代起源於多樣的大型組織、特定社團、職業與貿易的工會以及各種政黨的各種觀點與利益並加以反映。第二種轉型是,作為現代代議民主特徵的政治代表形式(一個將授權代表與個人代表連結在一起的意涵),已因受到對特殊利益不停的追求、對個人代表行使影響力以及以壓力團體作為決策核心的影響,而遭到破壞與顛覆。第三種轉型是,現代民主已經證明了無法抵制或消除寡頭權力(權力由特權少數來共同運作),它充斥在當代社會許多菁英的活動中,並取代經由代議民主程序而來的個人自主性的觀念與自由的實踐。

對民主化的第四個限制是,沒有擴張到與政治比鄰的其他社會領域,並且無法將民主深入到大企業與官僚制度。這種發展反映出作為一種社會民主之當代民主的缺陷:不是經由那許多有權參與涉及本身決策的人來定義,而是由他們所能行使權利的許多脈絡或空間來定義。第五,「不可見的權力」



(invisible power)之持續(以安全複雜性、秘密國家、非正式黑社會組織與其他可避免公共責任的組織化方式等這些形式),降低公民以權力控制這些事物的能力。最後,第六個「轉型」經由逐漸增加的政治冷漠,以及在被賦予政治權利而不去使用它們的人之間這種漸增的傾向,取代了政治活動與政治參與的教育過程(Bobbio, 1987, pp. 26-36)。這些轉形也會被詮釋為一種崇高民主理想的「毀約」(broken promises),它的實行採取「粗糙事實」(brute facts)的形式,遠不及與其剛出現時所伴隨的渴望。這些轉型的基礎是由巴比歐論文的摘錄中所勾勒出來的,現在你應該閱讀一下這篇摘錄的文章。

---

習作 6 : 現在請參照「閱讀資料 C」,巴比歐所著的「民主的未來」一文。由巴比歐所提出三種毀約的根源是什麼?簡要地勾勒出它們存在於民主實踐中的限制。

---

巴比歐將當代民主的毀約,追溯到在現代社會中科技專家的重要性,以及科技與民主的反命題關係(antithetical relationship),現代社會中進步的官僚化以及民主國家與官僚制國家間已發展出(不少是由於福利主義的興起)的多樣關係,並且也追溯到就它們逐漸增加的貨物、權利與服務的提供而言,民主需求快速的增長。在這種觀點下,似乎回應了像熊彼德等理論家的質疑,熊彼德從他「競爭性菁英主義」(competitive elitism)的角度來說明現代民主的改革,他發現民主的古典信條在現代社會的脈絡中是無法實現的,並認為現代公民的目標與傾向大部份是不適合的(參見企鵝版社會學辭典的菁英與政黨這兩個條目,並也可以參見 Held, 1985, Chapter 5)。就像阿爾布列斯特(Arblaster, 1987)所注意到的,相當多的社會學思想潮流以經驗

的角度, 強調在現代社會中民主實踐的障礙, 以及對促進民主原則實踐的可行性提出理論的懷疑。

達爾(Dahl, 1989, pp. 266-8)指出許多思想家(包括馬克思、列寧、莫斯卡、帕雷托、米歇爾與葛蘭西), 他們的觀點認為民主只不過是少數支配的另一種偽裝, 並連結常識性結論的論斷, 許多結論都是來自於社會生活的實踐經驗。他以下列這種方式介紹實踐的觀點:

難道任何在組織生活中較為積極的人都沒有注意到, 即使在表面上民主的組織中, 作決定的人卻很少, 大部份的人所做的不過是跟隨而已? 假如真的是多數被少數所統治, 我們會問, 為何會如此呢? 雖然, 上述作者對不同因素都予以特別的強調, 我認為他們皆會同意相對持久(即使最終來看未必是永久的)的結構與制度(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 在一個相較而言較長的時間中, 會強烈地形塑大多數人的選擇和機會。以一個極端的事件為例, 在一個軍事統治的國家中, 無論多麼地唯才是用或平等主義式的甄補及擢升, 也只有少數人可以進入統治團體。金字塔結構的頂端只有有限的空間; 而且就定義而言, 所有少數支配的理論將世界詮釋為其權力結構的頂端相較於底層而言是相當狹小的。所有前面提及的作者可能也會同意在近兩個世紀以來, 資本主義、市場與資產階級社會的結構與制度, 在決定支配型態方面有著巨大的重要性。就像這些結構也會影響到統治階級的特定組成, 哪種人可能可以進入, 而哪種人是不可以的。因為就是在這些結構中以及因而採行的方式, 個人與個人的聚集(即階級)可以獲致其支配(Dahl, 1989, p. 266)。

達爾所提及的這些作者代表著各種不同且矛盾的意識型態，以及少數統治的對照性觀念與其權力的基礎。

然而，他們不僅指出社會中存在重大不平等這個明顯的事實而已，而根據達爾(Dahl, 1989, p. 272)的說法，他們共同的信念是：一種能夠令人滿意而又近乎民主的情形是不可能的，而且民主只有在至今從未存在過的條件下才有可能發生，此外在可想像的未來它似乎也是不可能的。他們傾向於將民主的觀念視作假象，且在本質上不適合於現代生活。但是，在達爾的觀點裏，這些作者也有其他共同的理論傾向，亦即他們都有設定高程度普遍化與若干的模糊性傾向，並且他們不去論證透過其立場去建立的理論中所暗示的控制連結，或提出必須證明這些支配存在的證據。總而言之，他們暗示存在著一個證明民主不可能性的早先承諾。無論以悲觀的宿命論來標示現代社會，或堅持烏托邦革命性解決方案的希望，他們都表現出對當代民主能力缺乏信心。這些觀點明顯地與巴比歐對民主理想之「毀約」的討論有關連(特別是與科技統治及官僚制有關)，但兩者仍有不同。不同於菁英主義理論家的是，巴比歐較不傾向拒斥人民主權的想法或質疑代議政府的過程，反而主張社會民主的擴張和社會的民主化。

但是，如果在現代社會中給予民主化的情況不是全然有利，加上民主的進展在先進資本主義下也相當有限，那麼其他地方的發展是絕不會令人感到印象深刻的。去殖民化在一九四五年之後的幾年蔚為風潮，並導致了西歐各帝國的解體，而在第三世界看到許多新的獨立國家誕生，以及國家主權有更廣泛的國際基礎之建立。具有細緻技巧的議會體系很少顯示出太大的存活能力，不過，民主的社會經濟前提條件再次透露出其重要性，正是如此也證明了民主形式的脆弱，以及由發展原則所主導的民主過程是容易受到攻擊的。在一九八〇年代，達爾(Dahl, 1989, p. 239)能夠找出人口一百二十六萬的波札那

(Botswana), 作為全非洲大陸唯一的多元政體。

在國家統一或是整合性文化認同上的欠缺, 若結合了對快速經濟發展的可見需求、國防(或對外侵略)與社會動員, 如此會傾向於以獨裁統治替代形式民主, 儘管這麼做並不必然就會創造出更好的社會經濟發展條件。如印度, 對議會民主形式的頑強堅持, 實際上是遭受到批評, 這是由於其造成了一個落後的複雜社會體系, 並且阻礙進一步的社會經濟發展(Moore, 1967)。但是, 就如我們已經看到的, 在全球範圍中的民主化過程在一九七〇年代再次蓄積了實力, 亦即在南歐、拉丁美洲、東南亞甚至在東歐都獲得了特殊的成果。摩爾在一九六〇年代晚期出版的著作, 寫到很少有證據足以證明有朝向民主的國際性進展, 而且後殖民的政治發展在全球許多地區也是令人失望的。這種說法或許可以用來解釋摩爾在論及一般認為的世界最大民主國家(印度), 有關其挫敗的經濟發展所顯示出的悲觀主義, 同時他指出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作為「現代世界的路線」(routes of the modern world), 而相較於建立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之自由主義民主的路線。

民主希望的挫敗在非洲的事例中特別顯著, 其貧窮與經濟發展的問題始終特別明顯, 而各式各樣獨裁統治的形式也仍然是牢固的。在一些亞洲國家(台灣、南韓)中朝向民主的試驗性運作也是相當著名的, 而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程度與比率一直都特別令人感到印象深刻。特別是在資本主義成長的形式中, 民主化與經濟發展的連結, 似乎再次被更晚進之發展所強化。就如我們所注意到的, 摩爾這本影響深遠的著作, 所關心的不僅是獨裁統治與民主的社會起源, 而且還討論到朝向現代世界發展的各種對比性路線的性質。就如摩爾所強調的, 朝向現代世界發展的各種對比性路線, 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中將自身呈現出來, 而且清楚地標示出他們出現的時間。其中的穩定性與長期可行性顯示出重要的差異。在軸心國(Axis powers)

戰敗後以及整個二十世紀下半葉,就像現在已經穩固建立的已開發資本主義國家,已採取了佔優勢地民主政治形式。法西斯主義式「由上而下的革命」(revolution from above)不再被視為是一種可行的當代現代化的形式。

更晚近出現的朝向現代世界發展的第三條路線(third route)被劃分出來,也就是共產主義式「由下而上的革命」(不同於資產階級民主路線及法西斯主義的獨裁統治)也成為問題,不僅是因為它實際與潛在的政治性質,甚而還有其作為一種可行的現代化工具之地位(Lewis, 1990, pp. 253-4)。當代的經驗似乎一方面肯定政治民主確實與現代社會與先進資本主義發展存在著密切的關係的早期主張,另一方面,認為持續而有效的現代化在某種民主的架構中更成功地被達成(雖然沒有包含任何決定論式的機制)。然而朝向現代世界發展的第三條路線(共產主義),是以透過農民革命所建立的左翼獨裁統治為其特徵(Moore, 1967, p. xii),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強有力地崛起(蘇聯在東歐取得擁有衛星國的帝國形式,並且找到新的結盟夥伴,如中國、北韓以及後來的北越),共產主義路線作為現代化的一種變形,其可行性後來也證明是相當可疑的。如果民主原則的接受及其實踐在已開發資本主義國家中有著相當清楚的限制,另一條邁向現代世界發展的路線也確實無法提供民主化更佳的基礎或是穩定的社會發展形態。

### 三、後極權主義社會的民主化

在一九七〇與一九八〇年代,全球民主化趨勢的強化,是與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的全球經濟整合之迫切壓力有關,它提供東歐後極權主義社會轉向民主的特定脈絡。這些社會較不會面臨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所看到的對民主的限制,而出現較多的是民主轉型的難題,其中結合了在許多當代社會所發現的緊



張關係, 以及具有問題的政治與社會發展型態這項遺產。

然而, 東歐後極權社會的持續與民主擴展的難題, 與已開發資本主義的情況有所不同。儘管如此, 他們仍反映出大多數現代社會所共同面臨的組織性兩難困境, 還有它們自身歷史發展的路徑所帶來的特殊結果。共產主義統治的遺產對東歐民主化有著重要的影響, 如同我們已經知道的部分, 那種包含著特定政治發展綱領的現代化策略注定是失敗的。其中一個顯著的情況就是對抗前共黨對公領域, 甚至部份私領域的支配, 更要對抗在社會生活中普遍的政治化。東歐並非是單獨經歷這種對極權主義左派統治衰敗的回應。法國理論家拉福特(Claude Lefort, 1988, p. 4), 在一九八九年共產黨黨國體制出現明顯危機之前就已經寫到, 蘇聯或中國社會主義神話的崩潰與馬克思主義受歡迎程度的衰退(法國從一九七〇年代早期已經相當明顯), 已無法使政治想法復甦。並不令人訝異的是, 東歐共產主義也對官方的政治活動產生普遍廣泛的輕視與厭惡, 就如拉福特所注意到的, 「彷彿對集權主義的譴責暗含著對政治自身的譴責」。

對政治的厭惡與對所有政治人物的懷疑, 確實在東歐獲得力量(儘管它絕不是限定在歐洲或共產主義社會), 並且促使市民社會自我意識的成長。因此康拉德(Konard, 1984, p. 92)在「反政治」一文中所呈現的, 可以從書名很明顯地看出, 其努力於「將政治擺在其應有的位置上」, 並讓政治本身呈現出「市民社會的精神氣質」。對曾經在二次大戰後的大部份時期都是生活在由共黨統治下的歐洲人而言, 已經過夠了中央組織性的政治活動, 政黨對社會生活的支配、領導者之宣傳與政治標語的無所不在。公共生活由一黨所壟斷, 會造成任何真實的自我統治或自主性活動的觀念從政治的想法中分離出來的效果。而就是這種經驗導致羅馬尼亞人在革命期間, 大聲疾呼他們是為「民主, 而非政治」(參見 Jorgensen, 1992)。這種結果可回想



捷克共產獨裁統治的崩潰：學生示威運動，一九八九年九月

到尼斯貝對單一制民主的結果與國家活動無限制成長之危險的批評性說明(請參閱第二節)。

但這也隱含了政治民主的建立與達爾所謂的多元政體的

發展, 政治體系的制度與形式使得民主社會成為可能。在共產獨裁統治下, 市民社會的反彈與對民主化的日益成長的驅力, 絕非解決了環繞在民主秩序的建立與運作的所有難題, 無論是實踐層次或是理論層次。很快地, 共產主義在波蘭崩潰之後, 這類特性小心地被用來避免政治衝突的公開顯露, 人民對政治領導者的回應是情緒性超過理性, 政治人物更為嚴厲的批判, 公眾不願意接受新政治制度的有效性, 這些都暗示了東歐人民對政治的厭惡並未完全被消除。就公眾覺醒與主要組織混亂的徵兆而言, 類似的回應可以在匈牙利與後共產主義的東德發現到(Lewis, 1990, pp. 260-1)。阿瑞托早先的洞見(Arato, 1985, p. 323), 認為在東歐民主化的一個關鍵因素與相關於其政治文化的民主化仍存在著高度相關。

在東歐共產主義秩序崩潰的速度與廣泛性, 意味著民主的前景是在缺乏任何關於民主的建立及鞏固的社會條件是否存在的肯定徵候下, 以驚人的速度開啟。然而, 現在應該相當明顯的是, 現代社會的民主化(至少在較老與已建立的民主例子中), 是一個包含廣泛衝突的冗長而爭辯的過程。在英國, 民主的出現明顯至少可遠溯至英國的內戰(Civil War), 及其後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 1688)的政治過程, 兩者都為憲政國家的體制奠下了基礎, 並提供一個解決宗教衝突及日後宗教寬容的架構, 其主要的貢獻在於民主與多元主義發展的建立。在美國和法國, 政治民主化的過程是起源自十八世紀末。在以上三個案例中, 大眾民主的出現在進入二十世紀之前並不沒有發展完全, 並且許多人可能會認為這個過程在許多重要的面向上仍未完成。

就現代民主的一般記錄而言, 這時間的尺度是較短的, 但是, 從後共產主義社會的觀點來看它仍是相當令人沮喪的。達爾(Dahl, 1989, p. 315)在下列陳述中, 提供了某些經驗性的引導: 「在已經存在二十年甚至更久的多元政體制度的國家中,

民主的崩潰及其為威權體制所取代的情形是極為罕見的」。杭廷頓(Huntington, 1990, p. 42)已經提出「兩次權力移轉」(two-turnover)的檢證標準, 而主張民主在下列情況下是已經制度化的, 亦即「當一個合法被選出的政黨或聯盟將權力移轉給另一個合法選出的繼任政黨或聯盟, 而這個第二次被選出來的政府在選舉失敗後也會自願放棄權力」。當然, 此一過程所需的時間長度是不太能確定的, 即使在一九九一年也僅有一個相對較新的民主國家(葡萄牙)通過這個檢測標準。至少有一點很清楚的是, 即民主不僅是歷史上的社會型態, 而且也是實質歷史過程的結果。

就現代民主的限制與問題而言, 隨著東歐共產主義的崩潰, 最可能做的事, 就是從事進一步的分析與預測, 以列舉出在民主化過程中可能最重要的因素。美國政治學者以及政治發展分析家杭廷頓指出六項因素, 同時他也作了一些特定的觀察:

1. 該國家之前的民主經驗到什麼程度。在東歐和捷克是位居領先的地位, 而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則位居另一個極端。
2. 該國家社會與經濟發展的水平。捷克與東德在此項具有優勢。
3. 威權體制的成就。在威權體制成功的民族, 似乎較有可能建立成功的民主。東歐國家在此項比率都不高, 但是, 東德與匈牙利可能是領先的。
4. 獨立社會與政治組織的範圍、深度與實力。波蘭在這個因素方面是唯一具有優勢的國家。
5. 政府採取與執行處理經濟改革之艱難決策的能力。沒有一個新政權在此項獲得分數, 但波蘭在企圖進行這個方面的工作是獲得領先。

6. 社會階級、區域與族群團體之間極化的程度。在大多數國家中, 都有高度對立的團體正著手發展政治意識並基於政治目的而進行動員。上述這些社會分裂所將引發的動盪程度是不清楚的。

關於後共產主義社會的民主化, 一個立即的問題在下述的事實中將被提出, 亦即市民社會對共產獨裁統治的明顯勝利可能不是導致政治民主, 而是民粹主義(populism)。這意指直接由「人民」進行政治支配, 而很少考慮到憲政制度的安排、權力關係的制度中介或少數權利的任何保障。社會更加零碎(fraction)的欲求與渴望, 可能更容易被後共產主義秩序的政治安排所滿足, 但是, 這與政治民主的建立不必然是同一回事。事實上, 與西方國家在其政治發展的類似階段的現代早期一樣, 後共產主義的東歐國家經驗著類似的困境與共同的難題。後極權主義發展的問題與在西方政治發展早期階段所看見的問題相結合。就如基恩(Keane, 1988, p. 22)對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明確回應所指出的, 市民社會「也能淪為戰場」, 並基於幾個理由, 主權國家的權力是市民社會民主化不可或缺的條件。就自身而言, 市民社會絕不是在強權中保障弱者, 或提供社會協調的核心點, 以及相對而言較低成本的衝突解決機制。在歷史的脈絡中與依照所有因素的範圍(社會的、經濟的、國際的、文化的)而扮演的角色上, 確實存在重要的差異。但是, 一些關鍵的選擇, 以及許多解決問題的方案, 是由於更廣泛且更有效的參與政府以及控制社會發展機制之要求的成長而成為議題, 使我們回想起之前已經檢視過的歷史衝突。其中一個問題是由沙德斯基(Wojciech Sadurski)在非共產主義政府形成後的一年在波蘭出版的文章中勾勒出來, 現在讀者可以閱讀這篇文章。



習作 7：現在參照「閱讀資料 D」，由沙德斯基所寫的「民粹主義與憲政」一文。

由沙德斯基所指出的政治困境其性質為何？以及針對波蘭社會問題企圖提出民主解決方案的人所面對的是什麼？而提出的解決方案又是什麼？

沙德斯基所提出來的困境是類似於西方早期所出現的情況，它刺激了對大眾民主結果感到憂慮者的恐懼：亦及，大多數人的需求可能會對少數人的權利恣意孤行。然而歷史性的西方恐懼是以階級為基礎的，而這些出現在現代波蘭的恐懼大部份是文化的、道德的與宗教的。在十八、十九世紀，西歐一個嶄新而權力逐漸增強的工人階級之渴望，以及在東歐經常是由宗教信仰來維繫並由強大的教會(此衝突首度出現在波蘭絕非偶然，因為該國的天主教會一直保有最強大的社會影響力)來組織性地支持市民社會的信念，它們兩者都是意味著在民主化運動中的驅力。彌爾對多數暴政的憂慮(在第三節開頭所指出的)，也回應了在波蘭的觀點，認為「一個以道德形成法律的國家是極權主義國家」(Polityka, 29, September, 1990)。

其所提出的解決方案也顯示出其相似性，他也指出自由主義民主的制度與程序。對此一問題的歷史性的西方回應是代議制度的發展以及有限政府的強調。在沙德斯基的引導下，將注意力放在憲政條款的重要性、公民權利的捍衛以及少數人自由的保障。這類衝突的解決不可避免地包括了一段長期的辯論與對立，團體關係的進化是一件相當複雜的事物，其很少為迅速和解帶來希望。如果與極權主義體系有所分別的民主是一個歷史的社會(Lefort, 1988, p. 16)，那麼民主化也就是一種歷史的過程，這個過程包括了在社會團體間既有關係的變化以及特



華勒沙與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定民主概念的演化。而這兩種因素都出現在有問題的民主化路徑中,而一九八九年東歐共黨獨裁統治的崩潰加速這條民主化的路徑。

上述所勾勒出的情境,主張東歐民主化的社會動力,並未消除既有民主程序與代議制議題(事實上它還強調其角色)的重要性,也未指出在西方所出現過的「社會民主」障礙的迫切移除(Bobbio, 1987, p. 55)。巴比歐論證道,西方民主化的關鍵過程所關心的不是從代議制到直接民主的轉移,而是先前受限於國家政治過程的民主權力,能擴張到市民社會的各種領域。這就是由政治民主發展到社會民主的當代民主化之意義。然而,就後共產主義的東歐而言,它暗示著政治民主的基礎必須更堅實地奠定在社會之中,而民主國家的制度也以本身的權利建立起來,而非多數偏好以及直接轉化為政府政策的市民社會之意見。正如在蘇聯的變化形式中,企圖實踐直接民主卻失敗的嘗試中所顯示的,如果要在民族國家的界限中達成,那麼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與代議制原則似乎是現代民主中不

可或缺的組成部份。

## 伍、結論

此一對現代民主的一些限制與西歐和東歐民主化問題的簡短考察,並未宣稱提供任何關於當代民主情況的判準或有關其未來發展的預測。儘管如此,對民主起源的說明及其發展所處的社會情況進行檢視,確實可以使我們獲知一些關於現代民主性質的事情,並且提供當代民主變化形式動態之洞見。讓我們檢討一下本章所提出的主要論點。

作為一種當代政治現象的大眾民主,其隨著工業與城市形式的現代社會之發展而出現與獲得進展。雖然其特徵的變形是在整個十九世紀的特定地區逐漸發展,並且只有在更晚近的時代才取得更廣泛的存在,但是,它的起源可追溯到十八世紀。它必然採取代議民主的形式(在當代民族國家普及的觀點上,它實際上是不可避免的),它與民主的古典模式出現某些對比,並且引發堅持直接民主觀念者的批判。更進一步而言,它的發展與資本主義現代化過程有密切的關連,而資本主義發展與自由主義民主之間的緊密關係更是為晚進在南歐、拉丁美洲與東歐的發展所確證。

在二十世紀晚期民主化的散播,雖然一直伴隨著一種逐漸成長的意識,亦即形式的民主程序是在微弱的社會基礎之上發展,但是,社會範圍對民主化是有所限制,並且現代社會生活的情況也限制了它的有效性。因此,這個考察主張,在許多國家中,民主的價值與程序都只是部份的成就與相對的脆弱,套用摩爾的話,這些國家在朝向現代社會發展是採取議會民主的路線,民主的若干基礎同時也成為這些國家建設成現代社會

的基礎。它的不穩定性在一些國家中似乎更大,像是東歐與部份東南亞,它們都已經融入了近來全球民主化的過程,或在其它如拉丁美洲的國家,在這些地方對民主的形式和渴望有著穩固的歷史,但是,民主的實行和成就總是一筆不堪的記錄。

不同的因素可能會進入不同的情境中。在東歐很可能證明了社會、政治以及更為明顯的經濟因素,對民主化過程來說是重要的。這是因為由共產獨裁統治所遺留下來的反政治遺產,以及市民社會成分的模糊意涵,在共產主義崩潰中市民社會扮演部份角色,它似乎也決定其著手進行的民主轉型之性質。然而,就是在達成堅實基礎的代議民主體制時,「社會民主」在現有西方政體中暴露最大難題的弱點與限制;而在像東歐等地區,就是因為形式民主制度與代議機制的弱點與不當界定的性格,似乎成為在民主轉型早期階段出現的最大不確定性的領域。

一般提出的市民社會民主的意涵仍然有著模糊性,因為它們傾向於強化共黨統治中反政治的傳統,並結合一些非民主政治文化的持續性因素以及鼓勵民粹主義,而不是用憲政的方式來解決後共產主義轉型所出現的問題與衝突。然而,這個評論並非意味著提出一個民主前景的負面評估或預測,而是一個包括各種因素之間複雜關係的合理觀點。民主並不只是歷史(有時是相當漫長的)發展過程的產物,而且還是無法決定性與無法預測性之因素的具體呈現。畢竟,極權主義的失敗克服了這類不確定性的成分,而這些不確定性也促使極權主義本身的沒落,並且揭露出民主的前景。

## 參考書目

- Abercrombie, N., Hill, S. and Turner B. S. (eds) (1988) *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2nd edn, Harmondsworth, Penguin.
- Arato, A. (1985) 'Some perspectives of democratization in East Central Europ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38, 2.
- Arblaster, A. (1987) *Democracy*,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 Bobbio, N. (1987)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obbio, N. (1989)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rinton, C. (1965) *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Dahl, R.A. (1989)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The Economist*, 8 June 1985, London.
- Hall, S. and Gieben, B. (eds) (1992) *Formation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eld, D. (1987) *Models of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untington, S. P. (1990) 'Democratization and security in Eastern Europe', in Volten, P. (ed.) *Uncertain Futures: Eastern Europe and Democracy*, New York, Institute for East-West Security Studies.
- Jorgensen, K. E. (1992) 'The end of anti-politics in central Europe', in Lewis, P. G. (ed.)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Macmillan.
- Keane, J. (1988)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 London, Verso.
- Konrad, G. (1984) *Antipolitics*, London, Quartet Books.
- Lefort, C. (1988)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Lewis, P. G. (1990) 'Democrat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 *Goexistence*, vol. 27, 2.
- Moore, B. (1967)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ndon, Allen Lane.
- Nisbet, R. A. (1962) *Community and Power*, New York, Galaxy Books. Polityka,



Warsaw.

*Penguin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see Abercrombie *et al.* (1988).

Przeworski, A. (1986) 'Some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O'Donnell, G., Schmitter, P. C., and Whitehead, L. (eds),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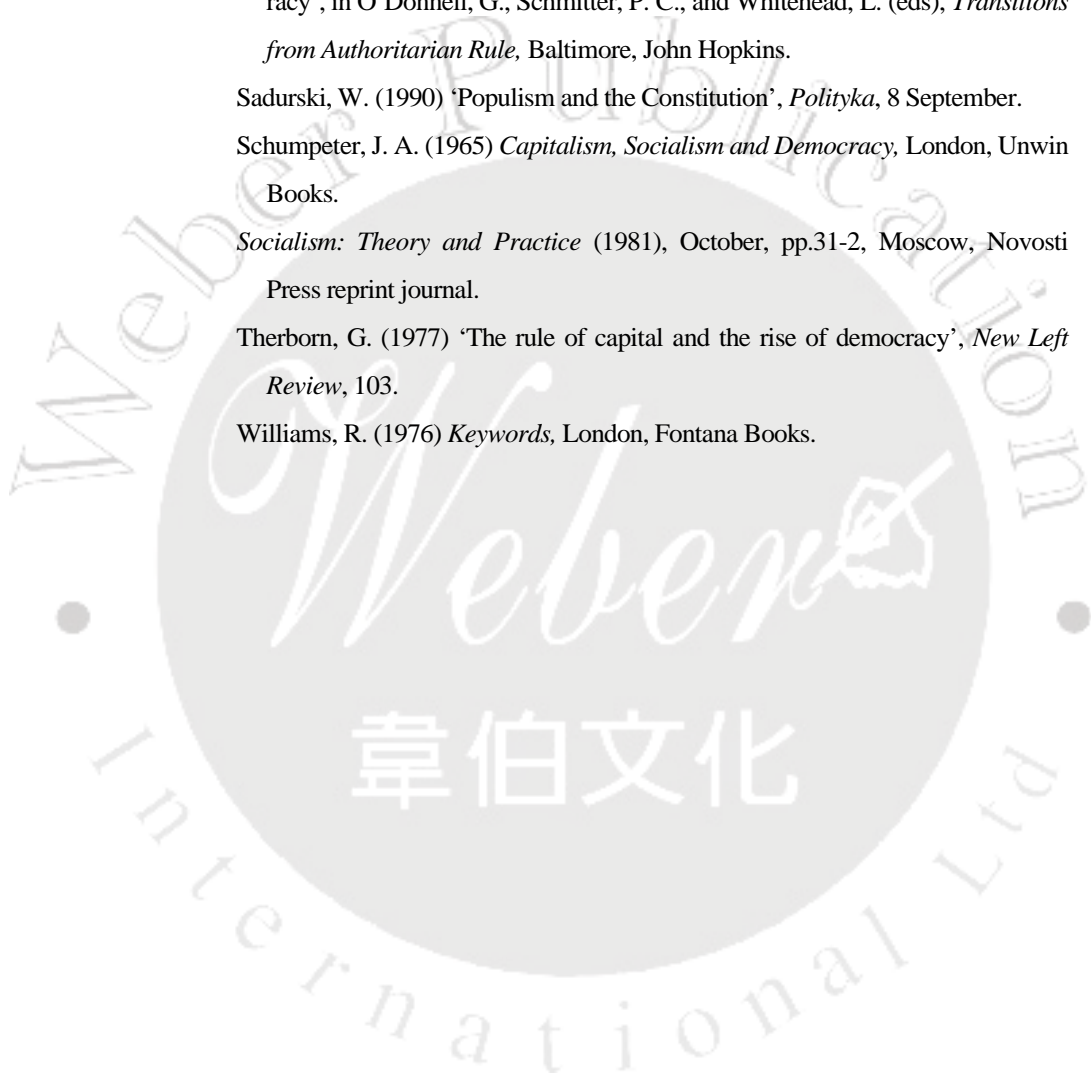
Sadurski, W. (1990) 'Populism and the Constitution', *Polityka*, 8 September.

Schumpeter, J. A. (1965)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Unwin Books.

*Soci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1981), October, pp.31-2, Moscow, Novosti Press reprint journal.

Therborn, G. (1977) 'The rule of capital and the rise of democracy', *New Left Review*, 103.

Williams, R. (1976) *Keywords*, London, Fontana Books.



## 閱讀資料 A： 資本統治與民主的興起

佘本(Goran Therborn)\*

### 一、資本主義與民主：內在的傾向

資產階級民主是藉由多樣而曲折的路徑所取得的，其中任何來自資本主義基本特徵的單純衍生是不可能的，或至少是嚴重誤導的。雖然如此，事實上民主並未在任何地方先於資本主義出現；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經歷了一種純粹內部的民主發展；並且所有主要的先進資產階級國家今日都是民主國家，這樣的現象自然會要求對某些資本主義內在傾向的說明。這些傾向可以暫時根據它們對資產階級民主的兩個核心特點之影響而分為兩組：(1)將大眾容納在部份的(part)政治過程中；(2)在代議政府與選舉競爭的情況下運作。

1. 資產階級民主總是以各種程度的暴力與大眾鬥爭來取得成功。因此，第一個內在傾向就是**支持人民鬥爭的形勢**。勞工的合法解放以及自由勞動市場的創造、工業化、資本的集中所有都是固有的傾向，它們也同時作為耐久且穩定的工人階級運動的基礎，而這都是在前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中的被剝削階級所無法獲得的。與馬克思對日益增長的資本主義矛盾之分析一致，在所有情

\*資料來源：Therborn, G. (1977) 'The rule of capital and the rise of democracy' *New Left Review*, 103, pp. 28-34.

況相同的狀態下，工人階級為資本主義的進步與發展所強化。這解釋了傳統的社會學研究中，認為民主與財富、識字能力和都市化所具有之相關性，這些因素影響了階級鬥爭中各種力量的關係。並且就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勞工運動在追求民主的鬥爭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

2. 然而，我們也要注意工人階級一般並未在激烈的戰鬥中，贏得對政治過程的分享。相反地，在成功地反抗而進行改革的時期之後，常常會對資產階級做出讓步。很顯然地，工人階級的參與必須在某種意義下符合資產階級的好處。雖然，德國與奧地利在一九一八年與一九四五年(也可能在一九一八年的比利時與瑞典)，以及一九四五年的義大利，選擇資產階級民主是企圖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而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實際捍衛行動，似乎並未直接成為決定性的因素。在所有這些案例中，不是暴動的無產階級，而是外國軍隊推翻現存的政權，於是舊有的內在民主勢力最後取得優勢。而更重要的是，工業化戰爭的資本主義技術。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同時與大規模徵召的軍隊，以及軍事生產的全民動員所進行的戰鬥。為了這種努力，甚至威瑪德國都同意社會民主派人士進入政府機器中；而也有與這種背景相反的情況，就是在比利時、加拿大、英國、與美國的選舉權擴張。

3. 可以在每一處看到的國家統一與解放，被資產階級作為一種策略，因為其對貿易及工業之發展與保護，以及突破封建王朝權力是必要的。並且為了這些目標，通常會發現到獲得人民的支持是無價的(invaluable)。在丹麥、德國、挪威、芬蘭與義大利(因為帝國主義式的利比亞遠征)的選舉權擴張都形成國家統一過程的一部份。

4. 生產力的狂熱發展是資本主義剝削模式的另一個特點。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早期的自由主義者可以否認民主與私有財產之相容性的其中一個主要理由是，他們擔心人民立法者與自治體會大量加稅。然而，他們忽略了資本主義的彈性與擴張能力。高度

的稅收既沒有除去私有財產，也沒有除去資本累積。生產力的提昇使得剝削率與被剝削大眾的實際收入同時增加成為可能。當然，這並非本身就有助於民主。但是，它關係到提供資產階級，利用空前廣泛的空間來巧妙地處置被剝削的大眾的問題。

5.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以非常普遍的方式審慎地討論到人民動員與工人階級併入政治的過程。但這種動員不必然是民主的。以其非常不同的方式來看，戰爭期間的威瑪德國，法西斯主義與第三世界的「民粹主義」都證明了這點。資本主義民主在已知的生產模式中是一個獨特的特徵，其為一種非人格性的(impersonal)剝削模式，包含了資本的統治，而非資產階級的人格性支配。它當然不是在自動機器的方式中發揮作用，但是，它確實是在非人格性的市場競爭之情況下，為追求更大利潤的生產來運作。資本統治需要一個國家的存在(同時進行內在與外在的支持與保護)，但只要它支持資本主義「市民社會」的獨立領域，國家就不需要由資產階級來進行人格性的管理。並且在民主化的長久歷史中，資產階級政治人物已經學習到在其安排之下，保持國家與資本需求和諧的許多機制。

6. 我們已經看到工人階級為了普遍選舉權與自由選舉由政府所作的戰鬥，本身從未足以促使資產階級民主得以被採用。這引起一個問題：資本主義是否有其他的內在傾向，其在某些情況下，除了工人階級鬥爭外還可能產生民主化的力量。一種這類的傾向會立刻被指出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傾向於產生一種**內部競爭**(internally competing)，且**和平非統一的統治階級**(peacefully disunited ruling class)。資本在其發展中被區分成幾個部份：商業、銀行、工業、農業、小型與大型企業。除了出現重大危機或從敵方(無論是封建無產階級或競爭的民族國家)而來的劇烈威脅的情況下，資產階級的關係不會包含可與原有朝代王權正當性及封建主義的固定的階層組織相比擬的統一因素。進一步言之，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傾向摧毀小商品生產(petty commodity production)之前，通常

會刺激它的擴張。因此，農業的商業化將自我維繫的農民轉形為具有明顯自我利益的農業小資產階級(*agrarian petty bourgeoisie*)。

在缺乏單一核心的情況下，某種選舉、熟慮及代表制的政治機器成為必要。因此，有產的共和制度(*propertied republics*)或議會王權制都是發展在資本主義國家形成的早期階段，例如義大利、德國、瑞士的城市共和國、低地國的聯合省(亦即荷蘭)、英國、美國、法國及比利時(後者在一八三一年後)。關於出版自由，其出現的物質基礎是發行報紙成為如其他型式的資本主義企業。這仍然只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民主，並且資本的細分化只促進了包含其他人口的民主與上述所指涉的其他傾向的連結。因此，在許多偶然軍事失敗的例子中，決定性的角色顯示出資本主義並不必然發展出充分強大的力量，來將民主的基礎擴展到大眾。

## 二、民主化與階級鬥爭

在最近幾十年來，儘管有著醒目的相反的首要(*prima facie*)證據(歐洲法西斯主義、第三世界軍事獨裁等)，但是，在資本統治與資產階級民主間一致的「正常」關係的功能主義與/或進化主義概念中，經常啟發了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者的分析。我們藉由對建立在主要與最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民主其政治叢集(*political constellations*)的歷史檢證，已經透露了這類普遍論證與解釋假設是不充分的。

儘管如此，資產階級民主不僅是歷史的偶然，並且資本主義並未包含有助於民主化過程的諸多傾向。因此，我們經常且正確地觀察到，資產階級民主保留了在基本的統合架構之中的競爭性區分，即使這個陳述是以天真的理想主義方式，藉由涉及意識型態與各種「政治文化」來加以詮釋。但是，資本主義興起之具體的經濟和政治動力，確實包括到對新分化的統合鬥爭與新分化的單一制發展。這顯得像民族國家從王朝的正當性、封建冊封(*feudal*



enfiefment)及地區傳統的障礙與界線脫離出來。國家主權與單一制的建立起源於對抗王室專制主義(royal absolutism)、外國舊王朝勢力及地域區分離主義的鬥爭中。這些利害關係的表現有：十六及十七世紀荷西戰爭、十七世紀英國的革命與內戰、美國的獨立宣言、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一八三一年八月比利時革命、瑞士、義大利、德國的統一、加拿大、澳大利亞與紐西蘭殖民地的獨立、日本的明治維新(Meiji Restoration)、丹麥的憲政艾達國家(the constitutional Eider state in Denmark)、挪威與芬蘭的解放(emancipation), 甚至在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 empire)的憲政鬥爭中。只有在瑞典, 由於有著從十八世紀以來長期持續的國家統一, 以及社會階層與議會的獨特混合, 所以是反舊王朝與反地區的民族鬥爭, 並非是早期民主化過程的核心成分。

貿易與工業的自由創造了一個分化競爭關係的網絡, 其衝破了統一與主權國家的新統治階級。市場取代了中世紀集權主義式的封建主義之階層金字塔。而民主化的過程就是源自於這個民族國家與市場的統一和分裂中。基本上這是以兩種不同方式的其中一種來發生的。在某些案例中, 民主首先被引入獨自擁有投票權利並組成代議制或共和政府的上層資產階級(包括商業化的地主)。資產階級的其他部份與小資產階級隨後根據不同的速度與樣式, 被納入這個結構中。然而, 資產階級革命半途中止的地方, 民主化就開始成為舊地主統治階級(包括其最頂點, 統治王朝)與資產階級間的憲政妥協(constitutional compromise)。然後, 這個體系不是發展成像斯堪地那維亞、荷蘭、比利時的有產民主, 就是成為仍然是基於擴張選舉權而大部份非民主的政府形式, 例如奧地利、德國與日本。

當然, 只有跟隨這過程的主要路徑, 並且像一七九三年雅各賓政權(Jacobin regime)的特定的迂迴路徑也必須加以考慮。但是, 如同我相信它們已經做到的, 假如這些路徑正確地表達出普遍型態, 那麼我可能會下結論認為資產階級民主, 同樣地就像其雅典

的先驅, 首先單獨出現在統治階級的男性成員間。只有在長期鬥爭之後, 這些權利也才擴張到被統治者以及被剝削階級。

先不管瑞士的例子, 該國的武裝男性工匠與農民在一八三〇年代、一八四〇年代與一八五〇年代的一連串暴力鬥爭後, 贏得了民主權利, 並非是第一階段的兩個主要過程中的其中任何一個導致為所有成年男性的民主建立, 更不用說全部成年人口。因而, 有了這一個特殊的例外, 競爭性資本主義現在由於自己積極傾向的結果而導致資產階級民主。然而, 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分析, 必須集中考慮這個體系的矛盾。並且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基本矛盾的發展, 帶來了超越統治階級及其支持者的界線。因此, 民主鬥爭的第二階段大致是由勞動階級的出現及勞工運動所型塑。我們已經看到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如何產生一個被剝削的階級, 他們所具有的組織化的反對能力遠優於任何一個先前出現的被剝削階級。事實上, 勞工運動幾乎到處戰鬥, 不僅是為了更高的工資與更好的工作條件, 而且也為了政治民主(它是目的本身, 如英國憲章運動或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貿易聯盟運動)或是作為社會主義鬥爭(屬於第二國際的政黨)的整合部份。

然而, 工人階級運動如今都能夠藉由自身未受協助的資源而獲致民主, 其實是說明了許多資產階級統治的力量。從一八四〇年代的憲章運動到比利時社會民主派人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 及日本工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 這類企圖最後總是失敗的。只有與外在聯盟結合, 無財產的大眾才能夠取得民主權利; 並且最重要的是有產的少數在最後回應了時間與形式的關鍵問題(亦即民主何時以及如何被引入)。如此, 民主化的過程展現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架構中, 其凝結在資產階級的民主形式中, 而非開啟了人民革命與社會主義轉化的道路。

## 閱讀資料 B： 反政治

康拉德(Goerge Konard)\*

### 我們所擁有的民主：就在我們周遭

東歐最重要的民主運動所選擇的名稱：團結工聯(Solidarity)決非偶然，其意指社會的自發凝聚力、獨立於國家之外、從基層進行組織，而且地下組織容易驅動並無法加以根絕。

在我們所處之世界的一些部份，是正在尋找其本身的真正運動，其中一個會從中歐與東歐的當代現實情境中成長出來。只要我們無法對我們的身分與自我認知達成共識，我們的必要意志(will of necessity)就會親近於其他人。我們在嘗試描繪出中歐的意識(consciousness of Central Europe)，感覺我們的道路，試著避免東方與西方兩者的模式。我們就算想要也可能從未真正地接近西方的模式。

我們的波蘭友人所做的努力(表面上)遭遇失敗；但是，共同自我統治的需求並非是過往的戰術姿態，而且它不會從議程當中消失。何處沒有自我統治，何處就會陷入消極依賴的狀態中；若缺乏方向則無法進行任何事，而當獲得方向的時候，就會拖延自我統治的實現。假如沒有自我統治，我們會忽略國家經濟搖擺於危機的邊緣之上。自我統治的需求是新中歐意識型態的組織焦點。

在團結工聯的各個共同體中，對統治權力並不像在廣泛的社

---

\*資料來源：Konrad, G. (1984) *Antipolitics*, Quartet Books, pp. 195-202.

會當中及相似情境的團體間進行溝通那樣有興趣。只要我們國家的主權基礎並非是自我統治,而是共黨的「民主集中制」(democratic centralism),新聞檢查制度(censorship)將會維持偷工減料的(jerry-built)權力結構。

中央化的政黨統治與檢查制度是無法分開的。因此,民主運動基本上是反檢查制度。擴張消費無法代替思想自由,並且無論如何也沒有很多的機會取得;檢查制度與短缺經濟也是無法分開的。匈牙利的生活水準比其他共黨國家要高,在相同程度上我們所採用檢查制度是較溫和的。

除了集體主義者外其他我們都可以接受,我們不會將共同體價值置於個人價值之上。除了共同體,我們論及具有自由與平等關係的自主性個人所組成的同儕團體,比權力機關可疑的有效性更有價值。

理論上,將一個共黨國家加以社會化要比資本主義國家容易。假如獨裁統治鬆懈、假如不畏懼坦克的時刻將會來到,自我統治將豐富了無論何處一起思考人民工作與居住的本身記錄。甚至在警察國家(police state)中也有自我統治,但只存在於私人生活的領域。

強迫從公共領域出現的輿論,轉化為從大眾傳播媒體到個人化的管道之對話媒介。這是賦予我們所處社會原始標籤的親密而活生生的口語傳統。既然不存在合法的反主張與反抱怨,由公眾所提出的官方宣傳活動的主張與抱怨引起直接的質疑。每個導引輿論的方法是掌握在國家的手中,但這個巨大的機器,若非完全無力,就是只有非常有限的效果。

在大量無法控制的私人對話中,我們自己的價值體系開始形塑。這並不與國家及資本主義的價值體系相同。對金錢與財產的尊重並未損害在設定社會思考傾向的年輕知識份子之道德意識中的其他價值。一種未分化的善良意志為它們取得首要地位,並且相較於以消費所組織的有限範圍的資產階級家庭而言,使自身感

覺更為廣泛。

自主性的緩慢革命並未在新人進入權威的人事組織後而達到頂點。我啟發自身這樣的假象，也就是在東歐的人們為自主性而努力，並沒有欲望爭取坐在部長的絨布椅上，並於麥克風與鎂光燈前隨意交談的機會。我或許是錯的：當有能力者有機會展示自己時，這是奇怪的反應。無論如何我仍然認為讓對權力不太有興趣的人繼續留在政府中。我的希望是，既然獨裁統治已經失去其革命光圈，東歐國家的政府將會學習到更莊重地運用權力。

我們主要在已經較為自由並且可以希望甚至更自由的領域尋求自由，在這領域中，因為沒有上級，我們是自己的老闆，並且我們在其中留置了最多我們自己的裝備：在我們休閒時間的領域中。我們花費在工作場所的八小時並非完全是屬於我們自己的。假如我們幸運且聰明的話，我們可以從事一些我們自己認為值得的、喜歡的事情，但是，對此並沒有保證；它不單單依賴於我們自己。在工作中我們有效地將自己推銷出去；我們不是屬於自己的家人或愛人，而是屬於雇主的。任何一個藉由花費在賺取生存溫飽的八小時來界定自身的人，已經賦予他的依賴一個深刻的內在肯定。一個工作世界的制度描述是對社會一種極端地貧乏的描述。假如自主性有任何意味的話，就是意味著我與我自己的地位是不同的。我側著身子遠離它。我進入它就如穿上戲服一般。

也許，匈牙利人已經最佳地展現其睿智，在其容易地進展而朝向達成下列事項：經濟與文化的並行運作，也就是說，在休閒時間的領域。小企業、獨立研討會、農業社團以及地下刊物(samizdat)的出版都在私人的家中組織起來。官方前提只屬於國家，家庭屬於「社會」。家庭與休閒時間：這些都是公民獨立的空間與時間的面向。

尋求面臨最少抵抗的路線，比起膽怯的作為更是足智多謀的鬥爭方式。我們的企圖並不在於克服制度，並以我們的意象來型塑，而是擴展私人生存的範圍。人們一周花費四十二小時在正式



組織內工作，但倘若剩下的一百二十六個小時是屬於他們自己的，那麼一個人就不得不注意(而且這是很詭異的，我們社會學家並未如此做)仍有可觀地運用範圍提供市民社會的發展。夜晚與週末是你自己的時間，你可以作些你自己想做的事，無論那是什麼。在工作時有檢查制度，在家中就沒有。僅僅想像可能有一百萬個家庭正在進行有趣的對話；如果有人不喜歡作這個，那你可能作些什麼？

在我們的社會中，民主批評通常所引起的，是對制度性組織中工作時間的反對，但這是最重要的事情嗎？這二十四小時不是我們人類現實中最重要部份，並且我們甚至為了自己的私人目的而修改某些時間。至少在東歐這裏，我不知道有任何人不試圖將其薪資的工作時間，轉為私人時間而與工作同儕進行一小段的友善對話，如果無法更多的話。就其它時間而言，這一百二十六個小時會有一個更好的處理方式，即使我們睡的很久，也沒有人會否認我們的夢是屬於自己的。以我們面前的時光機器攤開我們的生命，我們會得到令人驚異且具有啟發性的印象，我們花費我們時間中較大的部份在民主上，甚至在布達佩斯(Budapest)這裏。工作日是他們的，休閒時間是屬於我們自己的。

韋伯文化

International Ltd

## 閱讀資料 C： 民主的未來

### 巴比歐(Norberto Bobbio)\*

政治民主的方案被社會理解為，相較於今日已存在的方案而言較不複雜。承諾未被遵守是因為未預見、或非預期地突然發生的障礙，使得市民社會的性質出現「轉型」(在這種案例中，我認為「轉型」是一個適當的字眼)的結果。我將指出其中的三個轉型。

首先，當社會逐漸從家庭經濟轉變到市場經濟，再從市場經濟轉變為保護、調節與計畫的經濟，就有愈來愈多的政治問題之解決需要科技專家。科技問題需要專家，一個擴大的特殊人員之隊伍。這早在一個世紀前就被聖西門(Saint-Simon)所注意，他預測法學專家的政府為科學家的政府所取代。隨著統計技術的進步，已超越聖西門所能想像以及只有專家能力所能及的程度，所謂「科技官僚統治」(rule of technicians)的需求一直在增強中。

科技與民主是對反的命題：假如專家在工業社會中扮演領導的角色，他不能被視為僅是一般公民。根據民主的假設是有人在每件事作決定時都處於同一地位。相反地，科技統治宣稱只有少數具有相關專業技術的人才被要求作決策。就如我已經說過的，在專制國家的時代中，一般人民必須被排除在「統治奧秘」(arcana imperii)之外，因為他們被認為是過於無知的。現在當然一般人民確實不會那麼無知。但是想要解決的問題，像是對抗通貨

---

\*資料來源：Bobbio, N. (1987)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Polity Press, pp. 37-9.

膨脹的鬥爭、保障全民就業、確保收入公平的分配，難道沒有變得更複雜嗎？依其本質，這些問題不需要科學的或技術的知識嗎？其對街上的男女而言(不管教育程度如何)不會那麼神秘。

## 一、官僚化機構的成長

第二個無法預見的障礙是出現在官僚制規模的持續增加，官僚制指的是由上而下階層化安排的權力機構，因此，它完全相反於民主權力的體系。假定權力等級存在於任何社會中，政治體系可以被想像為金字塔的形式；但是，在民主社會中，權力是由基層向上移轉，而在官僚社會中，權力是從上而下傳送。

民主國家與官僚制國家在歷史上，相較於被認為兩者有如此完全地相互對比關係而有更大的交互連結。所有變得更民主的國家，同時也變得更官僚，因為官僚化的過程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民主化過程的結果。這種說法的證據是今日福利國家分解的事實需要空前的官僚機構，隱藏這種計畫，若不是分解民主的權力，那麼當然會將其降低到有清楚界線的限制之內。畢竟，韋伯都已經清楚地預見，民主化與官僚化攜手共進的理由，以普遍性地被理解。當有投票權利者正好是財產擁有者時，很自然地他們應該要求公共權威表現單一的基本功能：保障私有財產權。這同時導致有限國家(limited state)、夜警國家(night-watchman state)或現在所熟知的「最低限度國家」(minimal state)的信條，以及導致國家的組成成為有產者的結合，其是為了捍衛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對洛克來說正是財產權(right to property)。從投票權擴張到不識字者的那一刻起，不可避免地他們要求國家設立公立學校(free schools)，並負起傳統寡頭國家以及首先出現的資產階級寡頭統治所不知道的責任。當投票的權利也擴展到無財產所有者、到一無所有者、到所擁有的財產就是其本身勞動力者，它導致上述這些人要求國防止他們免於失業，並在正常程序中要求國家防止疾病與年老、孕婦

津貼、房屋補助等的保險架構。所以這就是不管喜歡與否，福利國家出現以作為從底層出現的需求的回應，這些需求是民主的，就這個字眼最充分的意義來說。

## 二、沒有足夠的能力來滿足需求

第三個障礙密切關連到民主體系「提供福祉」(deliver the goods)全面能力的問題：這個問題在最近這幾年來挑起所謂民主的「無統治能力」(ungovernability)的辯論。本質上這個核心的議題是：首先是在自由主義國家，後來擴展到民主國家，其促進市民社會從政治體系中的解放。這個解放的過程創造了市民社會成為需求政府的無窮來源之情境，政府為了適當地實現其功能並須做出各種適當回應。但是，如果產生於自由社會中數目日益增加、壓力日益急切、內容日益繁重的需求，政府能如何回應？就像我已經說過的，任何民主國家的必要前提條件是對公民自由的保證：包括出版自由、集會與結社的自由，所有這些管道都是公民用來向政府要求好處、津貼、特別費用、資源更平等的分配。這些需求的數量與快速轉變已經呈現出這種情況，無論效率如何，沒有政治體系有能力處理。這導致所謂的政府「超載」(over-loaded)以及政治體系做出激烈抉擇的必然性。但是，一個選擇會排除另外一個，並且不做出某種選擇會產生不滿。

但它仍未因此而停止。公民對政府提出需求的快速，明顯的對比於民主政治體系容許政治菁英做出適當決策所具有繁複程序造成的緩慢。由於將需求投入體系中的機制與回應的機制逐漸不同步調之結果，前者的運作是相當快，然而後者卻愈來愈慢。這正是發生在獨裁體系中相對的情況，它能控制需求，之前它已經阻礙市民社會的自主性，並且既然它免於觀察特別像在議會體系中所進行的複雜決策程序的義務，所以實際上更快地作出適當決策。總而言之，民主長於提出需求，但不擅於滿足它們。

## 閱讀資料 D： 民粹主義與憲政

### 沙德斯基(Wojciech Sadurski)\*

當社會中的大多數人想將宗教列入公立學校的課程中，而少數人認為這是對他們宗教自由權利的侵犯，並且在學校中的宗教教導，即使是自願的，但是在與良知上的自由選擇不相合時，會構成一種壓力形式，那麼真正的民主解決方式是什麼？當大多數人反對墮胎的可能性，而少數人希望保留其進行此種手術的權利時，民主的解決方式是什麼？當大多數人認為猥褻出版品與影片應該基於道德理由加以禁止，而少數人希望有權利決定關於其是自己的閱讀物品與娛樂商品時，在民主政治中，我們應該作些什麼？

某些人對這些問題的答案毫無疑問。他們認為在民主社會中，大多數人的意志應該佔有優勢。當所有論證都已經提出時，剩下要做的僅僅是計算票數而已。如此，這變成是在現行爭辯的脈絡中，一個以統計來決定的公共輿論似乎支持希望以國家的強制力來強化傳統道德與宗教規範的人。在這種方式中也是一樣，**保守派急切地利用民主的論證**。一般人民的精力充沛的捍衛者批評「左派」(想像中的或真實上的)的菁英主義、缺乏健全社會理性的信念、對社會中大多數人的非民主對待。在這個論證的另外一面經常是無力的：它知道不想做的事，但是發現難以積極地表達其反抗保守潮流的成分。民主的論證作為反抗並無上訴的判

\*資料來源：Polityka, 8 Sept 1990, Warsaw.



決而出現。

它並不必需如此：在保守主義與個人權利捍衛者之間的論證，並不是「民主派」與「菁英派」之間的衝突。民主是一個複雜的概念，它包含的不僅僅是現今多數人意志的實現。當代西方民主國家沒有採取民粹主義體系的形式，在這個體系中有百分之五十一(或甚至於百分之九十一)的投票者佔多數就能夠依其意願而做自己想做的事。我們都很清楚。它仍然檢視被用來證明這類限制大多數人意志的論證，在同時並不會摧毀民主。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我們能夠指出將民主概念化的兩種傳統方式。根據其中一種方式，民主就是這種在其中社會的真正價值能夠被最佳地發現的政府形式。而在第二個概念中，民主是一種在各種競爭的利益與社會偏好之間達成妥協的方法。

幾乎經由定義，所有民主潮流很自然地分派給社會中的**大多數**(majority)一個特別的、特權的角色。但是，在這兩種傳統中，這個大多數的角色是不同的。根據第一個我們稱為「民粹主義」的傳統，大多數統治是因為它是「正確的」(right)。大多數的特殊地位是來自於這樣的事實，即它在某些方面更靠近於與真正理想及社會目標的同一。在第二個我們可以描述為「自由主義」(liberal)的傳統中，大多數統治並非因為更靠近於「真理」(the truth)的發現，一般而言在政治生活中這類目標並無地位。大多數的意志之所以必須佔有優勢，是因為所有公民的利益與偏好在形成法律與政策時都應該有同等的重要性，並且在各種競爭的利益與偏好的衝突情況中，每一個人的利益都分配到同等的重要性，這就意味著多數的偏好獲得優先權。

更加重要的是，少數的地位在這兩種現行潮流中也是不同的。在民粹主義的潮流中，少數就是錯誤的。它之所以錯誤是因為：**你要發現到自己處於少數當中就意味著你是錯誤的事實。**這簡單地將民主與未受限的多數意志之實現視為同一的作法，可以在(盧梭)學說中找到完整的理論論證。根據自由主義的概念

是相當不同的。因為政治的真正目標是利益的調和，大多數利益的優先權不必然就不可避免地意味著少數的利益與偏好是被忽略的。相反地：**自由主義民主的檢證就是尊重處於少數情況中的人的權利與利益。**這就是我們都知道的：民主就是多數會尊重少數權利的權力...

但是一個兩難困境仍然存在，就是在具體的利益衝突情況中，會發生它不可能調解所有既得利益政黨的利益。衝突的性質有時意味著具有一個「零合」(zero-sum)的性徵，一方的勝利意味著另一方的失敗。不是宗教納入學校課程就是不納入的情況；不是允許墮胎，就是不允許如此作。在這類情況下的「妥協」解決方法(即允許宗教教導，但只有在自願的基礎上；允許墮胎，必須以嚴格限制加以保護)通常是一種假象，就如我們所知道的，**實際上這是關於原則的衝突，並且某一方會將這種妥協的形式視做是一種失敗。**

因此，沒有一種理想的解決方式存在。但這並非意味著沒有好的解決方式，在這種意味下至少可以降低部份涉入利益衝突中的人之失敗的意識。此處，我們必須訴諸於制度與法律的解決途徑。對自由主義民主來說，而且我們再次強調，所有當代西方的民主在非常大地程度上，是自由主義的民主超過民粹主義的民主，它是訴諸於制度與程序來回應上述所提出的基本的兩難困境。這是基於更深刻的智慧，它主張假如在實質滿足不能被達成的情形下，程序正義通常是合適之替代實質滿足所有相關方面的解決方式。

我想到一個複雜的過程，其中是藉由普遍規則用原則性方式來設立政治決策(包括法律的規範)的限制，這些永久與事先熟知的普遍規則，不僅界定進行政治與法律決策(而且也包括領導器官的結構與權力)的各種程序，而且也定義個人不可挑戰的權利。重要的是政治體系在多數意志與憲政主義作為原則性限制的意義下，創造出了民主所發展出來的基本衝突的持續解決架構。因

此, 作為限制代議民主方法的憲政主義的功能是, 捍衛無法獲得代議部門代表其利益之人的自由與權利。

如此一來, 道德來自於民主而並非與民粹主義同義, 多數權力並不意味對少數擁有無限權力。個人與少數的權利不應該由公民投票來決定, 並且憲法應該保障少數免於多數的激情、焦慮與厭惡。此外, 這不僅只是哲學反省的結果, 也是由絕對地謹慎所指導的策略。今天是他們, 但是明天又會如何? 這是值得我們記取的說法。

#### **\*網路試閱版聲明\***

1. 敝社目前對書籍翻譯品質管控日益嚴謹, 每本書都至少經過四校的把關程序, 此試閱版已正式上市版本完全相同。
2. 讀者閱讀此試閱版本如果發現錯譯或不妥之處, 歡迎讀者儘速透過電子郵件 (Email : weber98@ms45.hinet.net) 向敝社反映, 以便在此書有再版機會時再次修正。
3. 如果讀者試閱此版本以後, 對本書的內容有興趣, 期盼各位讀者在本書正式上市後, 踴躍購買。您的選購就是對本社最具體的支持, 也得以讓敝社更加茁壯, 出更多好書。

**\*版權所有, 請勿做具商業屬性的運用\***